

【编者的话】

五月伊始，微博上再掀风波。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发微博称“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 1960-1962 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此言一出，引发轩然大波。茅于轼、冉云飞等知名学者皆发微博反驳林的言论，不少网友也以亲身经历力证“三年饥荒”的存在。

尽管林治波随后道歉，网上对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讨论却远未平息。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以一个略带反讽意味的开场，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众多网友的集体回忆描绘出与“正史”相左的三年；有网友甚至提议发起“口述历史”活动，在全国各地搜集“三年自然灾害”亲历者的记

忆，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事实上，对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争议由来已久，官方长期冠之以“天灾”之名，对死亡人数轻描淡写，民间却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究竟谁的记忆更为准确，而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去面对历史？本期周刊将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出发点，讨论个人如何认知历史。

周刊第一部分，我们将回顾围绕“三年自然灾害”的讨论。李寅初就‘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提出疑问，梳理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曹树基以人口学和地理历史学的方法，论证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是人祸，而非天灾。同时，他还提出了历史记忆说，以此解释各地区死亡人口的差异。

假若如曹树基所言，历史记忆的存在影响灾难的破坏程度，那么不遗忘过去就是避免灾难重演的最佳方法。茅于轼和杨继绳以亲身经历，记录个人在三年饥荒中所经历的精神与肉体双重苦痛。正是这些私人记忆的存在，使我们在“正史”阴影之下仍能保有反思过去、追寻真相的空间。

有人质疑，在国家记忆的洪流之中，个体记忆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它真的能够发挥作用吗？郭于华说，如果个体记忆能够进入公共领域，能够被讲述、被倾听，乃至于被分析和研究，就将获得一种解释、重构乃至解放历史的力量。熊培云认为，历史上的苦难不是一个人造就的，而是在所有人的参与中完成的。恢复个体记忆，既是还清历史的债，也是回归理性——不仅是个人理性的重塑，亦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塑。

周刊的最后为个人如何以行动认识历史提供了方向。郭于华深入陕北骥村进行口述历史调查，提出“在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思索，是什么让我们遗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发生扭曲？”。雷颐和章立凡回顾从 80 年代到网络时代民间历史的发展，这些细节丰富的民间书写为枯燥、残缺的历史填补上生动的一笔。吴文光发起“饥饿计划”，让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老人对饥饿经历的讲述，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承担历史的可能。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探】

10-1 李寅初:“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数十年来，海内外学者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各种推算，从数百万到 1000 万到 8000 万不等，数据相差悬殊，有如天地悬隔。”

2011 年 1 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29 年的历史，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臧否，学界与媒体一向争讼纷纭。诸多热点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 1958 年至 1961 年，即俗称的“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 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 年有 9 个县死亡率超过 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有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 1000 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此说遭到多位参与撰写此书专家的批驳。

以我目前所见，早在 1991 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就早已公布过相关数据。另外，在薄一波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亦有类似说明。本次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 万”，“9 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七十年》和《党史第二卷》两书中所述“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仅指 1960 年一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 1000 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来源。



“1000 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 年有 9 个县死亡率超过 100‰”的数据则来源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当代中国人口》。

其实《党史第二卷》涉及建国以来 29 年间的大量历史数据，但全书对这些数据罕有详尽注解，相形之下，著者如此对待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颇显意味深长。

1958 年至 1961 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饥荒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1958 年到 1961 年，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 1000 万到 7000 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这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在许多著述中都有所反映。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其近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 年、1959 年和 1960 年的 3 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 1500 万人，其中 1960 年约为 1000 万人（995 万人），1960 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1700 万~4000 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 2300 万的波动。

以上三条数据只是我从手边现有的几本通史性著作中的“顺手牵羊”。另外，还有很多专攻“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举不胜举。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 1997 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 A.J.科尔（Coale A.J.）教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

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 1958 至 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680 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时段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697 万。李成瑞认为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对其进行技术性修订后，按其计算方法，非正常死亡人口应为 2158 万，但两者相比，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

近年来，我读到的最新的，也是我最为信服的，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研究，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200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曹树基发表了《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他采用了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 1953 年、1964 年和 1982 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 3250 万。

现实中，相对于多数人“纠缠”数据的准确与否，还有一种“异类”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上千万根本就是一个愚弄世人的弥天大谎。《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即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援引孙景泽等人的说法，认为《党史第二卷》中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严重夸大，1960 年我国真实人口比 1959 年甚至还“增加 115 万”。

对于想要了解历史真相，又觉得“正襟危坐”的学术研究读来寡然无味的读者来说，还有一类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可供参考。

在此推荐两位“杨”姓作家：杨继绳与杨显惠。杨继绳原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他广泛搜集了“大跃进”时期的原始档案、回忆录等，在其于香港出版的专著中，他用较为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地反映了那一非常时期的种种“非常”，保存了最为鲜活的“历史记忆”。杨显惠，天津作家，从 2000 年开始，他接连发表多篇纪实性小说讲述了“大跃进”时期甘肃夹边沟等地的故事，后结集为《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出版。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很令人遗憾，对此问题，尚未有“众口一词”的答案。

《党史第二卷》中仍然沿袭《七十年》中的表述，无疑也是此种人言人殊困境的一种反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得出更权威的数据，撰写者们曾无数次讨论，但永远统一不了，引用任何一种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袭用《七十年》中的表述。但我以为，《七十年》中的表述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回避了1958、1959、1961 这三个关键年份的数据，即使是 1960 年的"1000 万"也是笼统的，没有做出更细致的"正常"与"非正常"之分。

为何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如此难以得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发表文章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点出了部分困境所在。他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虽然"非正常死亡"是研究"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所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无法严格操作化的概念，沿此思路本身就难以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再加上建国初期人口统计体制屡经变动，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干部的素质，数据可靠性较差，关键年份数据缺失等等诸多客观原因，困难之大，显而易见。

无论"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在《党史第二卷》中，对"大跃进"的历史有着客观地描述，对引发"大跃进"的原因亦有切实反思，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回避，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地应被我们后人铭记与反思。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经济学良心"之誉的阿玛蒂亚·森，在对世界各国的大饥荒现象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而新闻能否自由，很显然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阿玛蒂亚·森特意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援引了 1962 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这也许可以是我们反思"大跃进"的起点之一。

（李寅初，公司职员，业余撰稿人，长期关注中国当代历史。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30750100ui77.html）

【返回目录】



10-2 曹树基：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在河南，人口死亡最多的汝宁府境（信阳地区的一部分），1953 年人均粮食最多。当河南信阳地区的国家粮库囤满粮食，而信阳的老百姓却在大批饿死的时候，一个地区较高的粮食总产量或较高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能说明什么问题？”

提要：本文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 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 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 3250 万。将 1959-1961 年的分府死亡人口与 1851-1875 年的分府死人口进行对比，可知两个时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呈强负相关。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结果的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 1959-1961 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凯恩（Kane, Penny）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亡人口的估计[2]，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利用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

---

[1]本文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提出的，即灾前、灾后的人口死亡都是正常的人口死亡。事实上，灾前、灾后的人口死亡中，也包括因工伤、车祸、凶杀、溺水以及其它各种自然灾害引发人口非正常死亡，然本书定义的“非正常死亡”主要是指因饥荒饿死或因饥饿产生的疾病所导致的人口死亡。

[2] 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 年中国的大饥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29 页，第 100-106 页。(*Famine in China,1959-61, 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人口死亡的数量，也有归纳性的说明。[3]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观点。[4]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 1982 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与评论。

1984 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 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 1958 年至 1963 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 2700 万。[5]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 2200 万。

1986 年和 1987 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 1953、1964、1982 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 1981 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6]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 1700 万。

1993 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 1953-1966 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 1960 和 1961 年，中国人口净减少 1348 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 1960 年和 1961 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 2568 万，根据 1956 和 1957 以及 1962-1963 年平均死亡率作为 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 1395 万。

---

[3]Jasper Becker：*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John Murray, London, 1996.

[4]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97-110 页。在这篇文章中，李成瑞没有对于中国政府公布数据中的矛盾现象及学者们的质疑做出任何解释。

[5] Coale, Ansley J.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Report no.27,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安斯利・科尔：《1952 年到 1982 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 1984 年版，转引自李成瑞上引文。)

[6]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第 46 和 64 页；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4-106 页。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 1960-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 2521 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 1959 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 2791 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 680 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 3471 万。[7]

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 0-1 岁死亡的婴儿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 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650-1790 万，平均为 1711 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 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500 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 1959 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 400 万-700 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 年人口多于 1960

---

[7]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 年第 4-5 合期，第 13-22 页。



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 年人口多于 1959 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8]

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究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历年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得到地方数据的配合或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深入到省以下的政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此，本文拟对金辉的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并应用于省以下区域研究中。区域人口研究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只有通过对区域死亡人口的认真求证，全国性的人口死亡数据才有坚实的基础。

二、本文的资料与方法

至今为止，各省新修地方志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出版，而《人口志》又是每本新修地方志必备的内容。之所以不能通过新修地方志资料的累加来重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是因为许多地方志中并没有历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即使有，对于其可靠程度的确认也还是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证明，在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地区，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企图通过各个地区人口死亡数相加的方法来完成本项研究，是不可行的。

本文主要采用 1953 年、1964 年和 1982 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 1953 年和

---

[8] 关于地方志的编撰者如何在数据中作伪，请详细阅读拙著《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版。

1964 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 1958 年和 1961 年的人口。用 1958 年人口减去 1961 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

关于 1953 年和 1982 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学界已经没有太多的疑问，只有 1964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杰斯帕·贝克认为，在许多省，对于大饥荒负有责任的官员仍在掌权，他们完全有可能更改普查数据。[9]我认为这是一种基于逻辑而不是基于实证基础上的推测。根据这一逻辑，为了掩饰人口的死亡，饥荒地区的地方政府只能虚增 1964 年的人口。然而，这一虚增的代价是，1964-1982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必定会低于正常值，而事实上，这种异常在我的研究中从未发现过。地方志中披露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及相关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数据，大部分是真实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在人口死亡的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

本项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0]：

第一，鉴于 1953－1982 年间中国县级政区的巨大变化，本文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清代的府是统县政区，通常包括几个县或十几个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专区”类似，但不能完全对应。采用这一稳定的分析单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县级政区变动所造成的误差，即府境之内的县界变动不予考虑，仅对跨府的县界变动给予调整。采用这一分析单位，有助于笔者将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与 19 世纪下半叶的灾难与饥荒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第二，与人口普查数据不同的是，地方志中的数据多为年末统计数据，且政区大都经过细致的等面积处理，据此而得出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排除了因政区调整造成的误差。根据一府之中若干县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可以推得全府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从而求得灾前人口。县级资料越多，结论就越可靠。

第三，地方志不仅记载历年人口，而且记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一般情况下，两套数据是吻合的。在不存在迁移人口的前提下，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所得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根据人口总数求得的人口增长率或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一致。然而，在一些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前、灾后人口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完全不能对

---

[9] Jasper Becker：*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P.268.
[10] 关于本项研究的具体方法，拙著《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有更为详细的说明。

应。如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以至于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低得使人不能相信。在全国许多地方，灾后两年的人口往往被夸大。以至于 1963 年、甚至 1962 年的人口，已经接近或者超过 1964 年。[11] 在一些地区，人口总数是虚报的，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却是真实的，据此可知灾后的人口增长率。

灾后几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 1964-1982 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快许多。灾情越重，灾后几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往往越快。这一规律，也可以作为判断灾后统计数据真伪的标准之一。在人口死亡规模较小或没有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相当可靠。灾情严重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则往往虚报，对于这类地区的人口数据，需要认真甄别后使用。

第四，在一般情况下，大饥荒从 1959 年年初开始，至 1961 年上半年或年底结束。也有些地区的人口规模性死亡，始于 1958 年下半年，或结束于 1960 年年底，或延续到 1962 年。根据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求得历年人口增长率，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即意味着大饥荒的发生。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则意味着大饥荒的结束。本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第五，将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当作灾前人口的一部分。这样，在确定灾前、灾后时点时，即使将时间定得宽一点，也不会造成对于死亡人口低估或高估。

第六，有些地方志记载了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多数地方志没有此类记载。然而，如果地方志所载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历年人口总数是正确的，可以根据这三项数据求出净迁移人口。

第七，用某地灾前人口减去灾后人口，所得为净减少人口，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正常的人口死亡率，灾前以 1957 年或 1958 年为标准，灾后则以 1962 年或 1963 年为标准，具体视各地灾荒发生时间而定。在计算过程中，通常用 1959 年和 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与灾前人口死亡率比较，用 1961 年人口死亡率与灾后人口死亡率比较。至于蒋正华认为 1960 年的死亡人口漏报率只有 20%，远低于此前此后 40%的水平。我对这一观

[11] 城市因清退“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工可能出现灾后人口的持续减少，在农村，除了部分地区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的特殊原因外，类似情况不可能发生。

点持谨慎的怀疑。理由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灾后政府大灾中的死亡人口的清理，并未持积极的态度。

第八，在一些人口死亡规模较小的地区，利用上述方法也不可能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利用地方志所载历年人口数和历年人口死亡率数据，将各县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累加，得出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这一做法的缺陷是过度依赖地方志，当地方志的记载不详或找不到足够多的地方志时，就有可能造成遗漏。只不过，这类地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即使存在遗漏，遗漏的人口也不会很多。

此外，对于一个“府”而言，其中心城市的迁入人口主要来自周边农村，因此，本文在计算以府为单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时，并不将城市剔除，除非这一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正常，且无规模性的人口死亡。这样一来，因城市化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就可以不加以专门的讨论。

总之，本文的主要思路是，以 1953 年、1964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地方志所载资料求出各府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府的灾前、灾后人口，藉此再求出各府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12]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三、人口死亡分析：以庐州府为例

本文不可能展开各个区域的人口死亡情况的研究。仅以安徽的庐州府为例，说明上述研究方法的运用。

清代的庐州府辖合肥市、肥东、肥西、巢湖、庐江、无为、舒城。除了 1936 年舒城县部分地区划给新成立的岳西县外，少有其它跨府境的县界变化。1953-1964 年合肥市人口从 18.4 万增加到 43.1 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80.8‰。合肥市的两个附郭县肥东和肥西，人口大量减少，同期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9‰和-16.9‰。如不深究，可能认为合肥市人口的高速增长是将肥东、肥西县境的一部分划归合肥市所致。然而，将合肥市、肥东县和肥西县合计，同一

[12] 本项研究实际引用的地方志为 1050 种，另有数百种地方志因资料缺载或非灾区而被放弃。





时期三县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0.1‰，几无增长，而 1964-1982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 22.9‰。由此可见，合肥市及周边县份的人口损失相当严重。《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显示，1957 年和 1962 年，合肥市人口死亡率为 5‰左右，1960 年达到 11.27‰，死亡 6410 人。[13]然而，查《合肥市志》，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安徽省志》所载相同，1960 年人口死亡率却高达 16.23‰，死亡 9170 人。[14]《合肥市志》不可能夸大灾情。接下来的问题是，《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的数据源于何处，并在多大程度上隐瞒了死亡人口？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53-1964 年庐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1964-1982 年为 25.5‰。据此判断，三年大饥荒中，庐州府境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庐州府 1954-1957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4.7‰，根据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计算所得两个年份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 22.82‰和 19‰。合肥市、肥东、肥西、庐江、舒城、无为六市县 1953-1958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3.7‰，巢县 1953 年中至 1955 年底为 25.6‰[15]，与《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的记载大致吻合。庐州府灾前人口的增长速度不高，是由于当地遭遇了 1954 年大水灾，除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外[16]，政府还组织人口外迁。如无为县有数万灾民迁入江南的旌德、泾县等县。[17]尽管以后有部分人口迁返，但人口外迁已经对庐州府的人口增长产生影响。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据《无为县志》，1954 年移至邻县安置的灾民人口多达 128072 人，但全县人口并没有如此大的变动。这说明这类安置是暂时性的，不久灾民陆续返回家园。

庐州府境灾后人口增长速度的确定要复杂得多。如庐江县，1961 年人口为 64.3 万，1964 年为 67.1 万，三年中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14.1‰，然而，三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43.2‰、46‰和 40.6‰。如果两套数据皆能成立，则意味着灾后三年庐江县有 5.9 万

---

[13] 《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9 页。该书没有历年人口数据的记载。
[14] 《合肥市志》卷二《人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3-124 页。
[15] 《肥东县志》第二章《人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7-89 页；《肥西县志》第三章《人口》，黄山书社 1994 年版，第 65-71 页；《舒城县志》第二章《人口》，合肥：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76-83 页；《庐江县志》第三章《人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9-130 页；《无为县志》第三章《人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6 页；《巢湖市志》第三章《人口》，合肥：黄山书社 1992 年版，第 147 页。
[16] 郑玉林、高本华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1 页。
[17] 《旌德县志》第三章《人口》，合肥：黄山书社 1992 年版，第 86 页；《泾县志》第三章《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0 页。



人口的净迁出。这是不可能的。在舒城县，1961 年人口为 57.3 万，1964 年只有 57.9 万，人口几乎不变。然而，三年间该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45.1‰、44.2‰和 39.4‰。如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真，则意味着三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 7 万。这更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庐江和舒城两县皆提高了大灾中的人口。巢县的数据更加离谱，1964 年人口普查数仅略多于 1962 年和 1960 年人口，皆不可用。

肥东、肥西、无为三县合计，1961-1964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9.4‰。合肥市灾后三年净迁出人口 9.2 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5‰。不过，对合肥市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进行分析，仍可发现 1959-1960 年有 1.1 万人口的高估。这批人口主要来自政区变动中从邻区划入的人口。修正后的合肥市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3.1‰。将肥东、肥西和无为三县作为合肥市以外庐州府境人口增长速度之代表，加权平均，灾后三年庐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3‰。

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62 和 1965 年，庐州府境人口增长率分别为 42.01‰和 37.6‰，根据人口总数计算所得 1962-1964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6.4‰。这一数据略高于上述分析。兹以 3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测算庐州府灾后人口。

分别以 1953 年年中和 1964 年年中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别以 23.7‰和 3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可以求出 1958 年底和 1961 年底庐州府境的人口数。从 1958 年底至 1961 年底，庐州府净减少人口约 109.3 万。如上文所述，净减少人口还不是全部的减少人口。将大饥荒期间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自然增长人口计入之后，灾前人口还应增加，而减少人口也将随之增加。以肥东县为例，1959-1961 年平均每年人口出生率为 12.02‰，1957 年和 1962 年人口死亡率为 7.95‰和 9.18‰，平均为 8.57‰。三年合计，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 10.4 个千分点。依同样的方法，肥东、肥西、无为、庐江四县合计，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约 12.8 个千分点，合肥市约 36.4 个千分点。加权平均，约为 15 个千分点。为了计算的简便，可以认为，在庐州府境，三年大饥荒中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人口，大约占 1960 年庐州府境人口总数的 15‰。如此，庐州府境灾前人口还应增加 6.7 万。合计减少人口 116 万。

据上引各市县志，从 1959 年至 1961 年，合肥市人口净迁入 2.5 万，无为县净迁出人口 0.9 万。其它县因缺乏有关人口迁移的数据，需要认真讨论。肥东县 1959-1961 年的死亡人口分别为 1.6 万、8.2 万和 0.3 万。1961 年的人口死亡率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只有 4.3‰，不可

信。从 1958 年底至 1961 年底，肥东县人口净减少 18.5 万，三年中出生人口 2.7 万，死亡 10 万人口，自然减少人口 7.3 万。合而计之，共有 11.2 万人口不知去向。又因 1959 年和 1961 年的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当，故可断定不知去向的 11.2 万人口主要是在 1960 年失踪的。一年中一个县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流，县志中不会不提及。一个县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流，灾后不可能不返迁。外流人口的返迁，必定引起灾后人口的高速增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将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肥东县 1962 年净增 6.2 万，人口增长率高达 101.6‰，似乎是外流人口返迁所致。然而，1962 年人口已经接近 1964 年，如果 1962 年人口数为真，至 1964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4.7‰，显然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1962 年的肥东县人口数是虚夸的。从 1961 年至 1964 年，肥东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6‰，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41.46‰、46.29‰和 40.30‰，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如下文所述，安徽灾后人口出生率有可能浮夸，不足为信。然而，就灾后三年 36‰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而言，虽有人口迁入引起的增长，但作为合肥市的附郭，1962 年的遣返农村人口，一定有相当部分迁入肥东。要知道，1958 年肥东县人口少于 1957 年，即是大量人口迁入城市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 36‰年平均增长率包含有人口迁入因素的话，也只是 1958 年进城的农民返迁，而不是大饥荒中的外流人口迁返。很显然，《肥东县志》所载 1960 年死亡人口有重大隐瞒，数量多达十余万人。

巢县 1959-1960 年死亡 56251 人，1962 年巢县人口与 1960 年相当，死亡人口只有 2782 人，推算 1959-1960 年巢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 5 万。1960 年较 1959 年全县人口净减少 9.3 万，加上超过正常死亡率的出生人口约 1 万人，减少人口共约 10.3 万。1960 年净迁出人口 5.1 万，加上非正常死亡人口 5 万，合计为 10.1 万，与全县减少人口数基本相等。据此，巢县公布的 1959-1960 年人口数据似乎是真实的。只是由于 1961 年数据缺载，令人对这一看似真实的数据心存疑虑。

不妨对 1961 年的巢县人口进行以下推测。已知巢县 1962 年底人口为 45.4 万，当年净迁入人口 1 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5.78‰，用 1962 年年底数减去净迁入人口，再除以 1.03578，就可得到 1961 年年底人口的近似值 42.9 万，较 1960 年底的 45 万人口净减少 2.1 万。已知 1960 年的出生人口与正常死亡人口相当，假定 1961 年也是如此，在不考虑迁移人口的前提下，净减少人口也就是全部减少人口。如果 1961 年人口死亡率为 16‰，折合 0.7 万人口，至少有 1.4 万人口不知所踪。

或有人认为这 1.4 万人口也可能外迁。果真如此，三年大饥荒中巢县的净迁出人口将多达 5.6 万。一般说来，在外迁人口多的地区，灾后返迁人口也多。1962 年巢县净迁入人口 1 万，

看似这一规律的反映。其实不然，1962 年因忠庙乡从合肥市划回巢县，净增 0.7 万人口。[18]1963 年，巢县净迁出人口 0.8 万，死亡 0.4 万，出生 2.8 万，用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和净迁出人口，全县增加 1.6 万人口。巢县人口总数的增加，正合此数。不幸的是，1964 年人口普查数据只有 45.7 万人口，而 1963 年人口多达 47 万，仍然超过 1964 年，就使人不能不怀疑 1963 年的人口外迁，是《巢湖市志》作者编造的。1964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使得数据编造露出了破绽。

另外，《巢湖市志》还记载 1967 年全县人口 51.1 万，从 1964 年中至 1967 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2.4‰，相当合理。假定 1963 年的数据为真，从 1963 年至 1967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1.1‰，低于 1964-1982 年的 24.7‰。对于一个经历了大饥荒的地区而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 1953 年中至 1955 年底，巢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5.6‰。以此推及 1958 年，巢县人口有 56.3 万。根据上述记载，以 3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961 年底有人口 41.9 万，三年间净减少人口 14.4 万。1960 年人口出生率只有 7.54‰，与正常人口死亡率相等，1959 年人口出生率为 23.33‰，超过正常死亡率约 13 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 0.7 万，合计减少人口 15.1 万。上文证明 1959-1960 年净迁出 4.2 万人口为假，巢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即为 15.1 万。

无为县是三年大饥荒的重灾区，1964 年较 1953 年人口少近 20 万。1960 年无为县人口较 1958 年要少近 30 万，而县志所载三年大饥荒中的全部死亡人口只有 13.6 万。由于三年中净迁出人口不足万人，因此推断，《无为县志》隐瞒了大量死亡人口。在人口死亡数量多达 30 余万的无为县，净迁出人口也不超过 1 万人，可见庐州府境的外迁人口相当少。设各县外迁人口与合肥市迁入人口相当，则庐州府境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肥东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 年 7 月全县各地发现浮肿病人，非正常死亡增多。1960 年 2 月，有人以'肥东农民'名义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肥东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国务院非常重视，责成内各部和省、市、县有关部门进行核查，但这次核查，由于有的干部阻扰，弄虚作假，掩盖了真实情况"。这次调查没有结果，灾情继续发展。6 月 19 日，古城公社

[18] 据《巢湖市志》第一章《建置・区划》，忠庙乡于 1956 年划归合肥市后，又于 1962 年划回。《合肥市志》卷三《人口》的记载则是 1959 年划入，1961 年划出。划出人口 6718 人。

15 个社员误食农药拌的稻种而死亡。真实的情况应是，稻种拌上农药，以防饥民抢食，食者中毒死亡。同一记载还称："1961 年，在责任田的影响下，本县外流人口纷纷回归家园。"然而，肥东县 1961 年人口仍大大少于 1960 年，此说不真。

四、人口死亡成因分析

1、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与死亡成因

在 1959-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见表 1。

表 1 1958-1962 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单位：万

省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版。

说明：（1）江苏松江府（包括上海）、浙江温州府、江西袁州府、广东高州府、雷州府和佛冈厅，贵州普安厅、四川懋功厅、杂谷厅和松潘厅、河北（直隶）口北三厅、陕西西安府、干州、邠州、鄜州、同州府、延安府、绥德州、榆林府、甘肃庆阳府等 20 个府未经历灾荒。

（2）清代"府"境辖 1953 年的县，县有合并分折，故有小数。

杰斯帕·贝克认为中国的劳改农场大约有 1000 万犯人，其中至少有 20%的死亡率。其实，按照中国的劳改制度，劳改农场的犯人户口已经计入农场所在县，各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已包括此类人口。

依表 1，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 3245.8 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 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该如何解释多达 3246 万人口的巨大死亡。如果就事论事，现有的理论可以较为完满地解释 1959-1961 年所发生的一切。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都认为，战争和天灾可以在某一特定区域大量损害农业生产，导致广泛的食物短缺，并最终引起饥荒。也就是说，3246 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食物短缺所造成的。

从本质上说，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之上的。从生理学的观点看，这一解释无懈可击。因为，饥饿的确会导致人的死亡。然而，更深一步追究，就会发现这一解释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解释在同一地区，有些人因饥饿而死亡，有些人却生存了下来。

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涛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 Sen 的新观点。Sen 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思路。尽管人均食物产出的不足可能引起饥荒，但它只是众多可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人均食物产出得到维持的情况下，饥荒也可能发生。饥荒的出现，可能由于部分人口的禀赋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下降，也可能来自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化，这些都使得部分人口不能获得充足的食物。[19]林和杨首次以经济计量方法研究这一问题。他们

[19] Justin Yifu Lin and Dennis Tao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No. 460, January 2000, pp. 136-158，该文中文本名为《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 1959－61 年的饥荒》，由林毅夫提供给"大饥荒档案"。

发现，在 1959－1961 年严重的供给冲击下，一省的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该省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均粮食产出减少越大，引起的死亡损失也就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并且，城市偏向弹性——它衡量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对该省死亡率的影响——大约比食物供应量弹性大 72％。采用另一种衡量方法可知，被城市偏向解释的各省死亡率是被粮食供应解释的死亡率的两倍。这些结果指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和杨涛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他们所分析的人口资料及粮食资料来自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人口与粮食资料，研究者应当进行细致的讨论和修正，不能全盘接受。其二，城市偏向即城市食物的保障供给，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无论对于这一时代的经历者，还是对研究者，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利用经济计量方法验证常识，并无不可。然而，林和杨据此结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则失之偏颇。因为，这一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同类的农村地区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准确地讲，林和杨的结论是有条件的：在比较食物供应量和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饥荒的影响时，后一因素大于前一因素。然而，根据本书提供的资料，我们还可以证明，在以上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其它更为重要的因素。

2、人口死亡的省级差异

据表 1，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 18.4%，江苏占 2.9%，而浙江只占 0.5%，江西略高，也只占 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 6.8%，湖北只占 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 4.7%，广东只占 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 13.1%，贵州 10.5%，云南只有 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 6.5%，陕西只有 1%。在华北、河南高达 6.1%，山东为 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 1.1%，山西更低至 0.4%。

这一结果与 19 世纪中后期的战争与饥荒存在某种奇怪的联系。按照笔者的一项专门研究，可知 1851 年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 开始的西部回民战争（包括云南和西北）、

1876 年发生的北方大旱灾。从 1851 年至 1878 年的 27 年中，战区和灾区共有 1.16 亿人口死于屠杀、饥馑和瘟疫。[20]分省而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同，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以华东地区为例。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人口 1679 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 37.6%。浙江省死亡人口 1630 万，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 52%。江西人口损失 1172 万，占战前总人口的 48.3%，仍大大高于江苏，略低于浙江。从人口比例上说，浙江、江西的人口损失均大于江苏。在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讲，江苏人口的死亡都大大超过浙江和江西。一个世纪前发生过人口重大损失的浙江和江西，此次人口死亡的规模都相当小。

再看华中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湖南、湖北人口均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在湖北，死于战乱者多达 500 万，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 22.5%。湖南死亡人口大约 200 万，约占占前全省人口总数的 9.2%。一个世纪以后，湖北、湖南均遇灾荒。与一百年前的情况相反，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看，湖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均大大超过湖北。

同一现象还发生在西南地区。从 1856 年至 1872 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 270 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 21.3%。贵州和四川免于战祸，人口一直增长着。一个世纪以后，贵州和四川人口大量死亡，相对而言，云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就要小得多。

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 710 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 52%。甘肃的情况更为严重，战争中死亡人口多达 1240 万，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 71.4%。[21]在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甘肃人口的死亡比例大大高于陕西。仔细分析，原因在于 20 世纪上半叶继续发生的人口灾难。1928-1930 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关中地区大约 300 万人口的死亡，1920 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虽然也造成 23.4 万人口的死亡，但人口损失的规模与陕西相比，要小得多。

在华北地区，1876-1878 年的大旱灾导致山西人口死亡多达 882.7 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 51.4%。比较而方，此次大灾对于华北其它地区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或小得多。在河南，大灾

---

[20] 太平天国战争及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对于各地人口的影响，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的有关章节，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1] 在嘉庆《大清一统志》中，巩昌府人口数为 1895260。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05 页错为 3795260。笔者不察，并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沿袭。杨志娟撰文指出这一错误，详见杨志娟：《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民族研究》2003 年第 2 期）。因此，本文对于回民战争造成甘肃人口死亡资料，有所修改。

造成的人口死亡约 747.9 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 22.2%，山东死亡人口约为 194.9 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 5%，河北灾中死亡人口约为 288 万，占灾前人口 10%。在 1959-1961 年大饥荒中，山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只有数万人的规模，仅占灾前全省人口的 0.4%，其它省份人口死亡规模却要大得多。

在华南地区，广东人口死亡比例较低，与大批粤人迁往香港有关。另外，由于广东省居民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大饥荒中，来自香港的食品对于广东居民渡过难关帮助甚大。广东、广西两省人口死亡比例的差异，与历史时期的战争或灾荒无关。

更为精细的计量分析可以证明：1959-1961 年各省饥荒程度与 18 世纪后半叶的战争与饥荒有关，而与人均拥有粮食的潜在值无关。表 2 列出 1880 年各省死亡人口占 1851 年各省总人口的比例。这一人口损失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战争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因为，太平天国战争于 1864 年结束，而大旱灾于 1776 年才发生。1880 年人口不是战后人口，而 1851 年人口也不是灾前人口。为了分析时段的统一，截取此 30 年仍是有意义的。

表 2 19-20 世纪中国分省死亡人口比例及排序、1953 年粮食产量及排序

省名	1851-80 死亡比例（%）	排序 1	1959-61 死亡比例（%）	排序 2	排序 1+2	1953 年人均粮食（斤）	排序 3	1959-61 死亡比例排序4	排序 3+4
江苏	34.1	7	2.9	10	17	590.5	9	8	17
浙江	47.1	3	0.5	17	20	630.1	5	15	20
安徽	42.8	6	18.4	1	7				
江西	45.2	5	1.1	17	21	684.8	1	14	15
湖南	-3.2	12	6.8	4	16	669.0	3	3	6
湖北	14.5	10	2.2	11	21	656.9	4	9	13
福建	23.0	8	2.0	12	20	595.1	7	10	17
广东	-10.8	14	1.6	13	27	582.8	10	11	21
广西	-14.9	15	4.7	7	22	621.2	6	6	12
贵州	-16.6	16	10.2	3	19	494.4	13	2	15
云南	8.1	11	4.2	8	19				
四川	-23.7	18	13.1	2	20	675.0	2	1	3
山东	-9.5	13	3.4	9	22	511.9	11	7	18
河北	-16.8	17	1.1	16	32	355.6	16	13	29
河南	14.8	9	6.1	6	15	399.6	15	5	19
陕西	46.7	4	1.0	18	18	595.1	8	12	20
甘肃	71.3	1	6.5	5	6	463.5	14	4	19
山西	48.1	2	0.4	18	20	502.7	12	16	28

资料来源：1851-1880 年人口死亡比例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表 16-1 计算，第 691-701 页；1959-1961 年人口死亡比例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表 1-表 16；1953 年人均占有粮食量系笔者从各省档案馆所获各省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数得出。资料出处从略。

说明：江苏省 1959-1961 人口死亡比例的计算，已经将松江府（包括上海）人口包括在内。陕西人口也已包括全省人口，而不仅仅指四个灾区府的人口。安徽、云南资料缺。由于资料有缺，在计算人均粮食时，清代承德府境未予计入。排序 4 是排除安徽和云南两省之后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

人口死亡比例最大者排序为 1，最小者为 18。据表 2，除了安徽、甘肃、广东和河北四地，其它各省 19 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与 20 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正好相反，两个排序值相加，约为 19-20。这说明，就大多数省份而言，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下半叶，人口的死亡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一百年间的人口死亡程度达到了平衡。在排除上述四地以后，分别对其他 14 个省两个时期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值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是呈现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0.83 和-0.91）。

河北省的例外是因为该地崛起了两座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广东省的例外在于香港及海外华侨的支持。难以解释的是安徽和甘肃，需要深入到府一级政区进行细致的讨论。

3、人口死亡的府级差异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安徽是主战场。根据笔者的研究，战争中安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多达 1700 万，占战前人口的 45%。在经历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之后，安徽何以重新出现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将区域分析深入到府一级政区，可以找到与上文同样的答案。

兹将两个时代安徽分府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 3。

表 3 太平天国战争及 1959-1961 年大饥荒中安徽分府人口死亡数及比例（%）

府 州	1851 年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比例	排序 1	1958年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比例	排序 2	排序 1+2
庐江府	416.5	76.5	18.4	11	499.0	116.0	23.2	3	14
和州	50.2	0	0	12	75.1	19.3	25.7	1	13
滁州	70.4	45.8	65.1	6	84.5	11.1	13.1	8	14
泗州	184.2	69.6	37.8	9	219.5	25.3	11.5	9	18
凤阳府	511.3	166.9	32.6	10	662.3	150.0	22.6	4	14
颍州府	467.0	0	0	13	826.1	194.5	23.5	2	15
六安州	168.2	65.1	38.7	8	151.3	23.8	15.7	6	14
安庆府	640.0	360.0	56.3	7	339.8	33.0	9.7	10	17



池州府	322.0	280.0	87.0	2	109.6	2.0	1.8	12	14
太平府	173.0	130.0	75.1	5	152.8	9.6	6.3	11	16
广德州	64.3	60.1	93.5	1	47.4	7.2	15.2	7	8
宁国府	400.0	323.2	80.8	3	171.6	37.0	21.6	5	8
徽州府	271.5	209.2	77.1	4	107.0	1.8	1.7	13	17
合计	3738.6	1786.4	47.8		3446.0	630.6	18.3		

资料来源：1851 年资料来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 504-505 页；1958 年资料来自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中的有关章节。

表 3 分别列出安徽各府州 1851 年太平天国战前人口、战争中死亡人口及死亡人口比例，并对人口死亡的比例的大小进行排序。除了广德州和宁国府存在例外，其余各府州的序号加总值均围绕 15 波动。这也就是说，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外，在安徽，太平天国战争人口死亡比例大的地区，1959-1961 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比例小，反之亦然。最典型的地区是和州和颍州府，太平天国战争中几无损失，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比例最大；池州、徽州、太平三府州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排名为第 2、第 4 和第 5，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分别排名为第 12、第 13 和第 11。排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对安徽 11 个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呈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为-0.94 和-0.93）。广德州境和宁国府境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巨大的人口损失之后，何以几十年后又遭此劫难，原因不详。总之，太平天国造成安徽人口的重大损失，却仍有相当大的地区则得以保全，人口没有死亡或死亡甚少。这些地区在百年以后，成为人口死亡的主要地区。

甘肃的资料更能说明同一问题。将回民战争及 1959-1961 年大饥荒中甘肃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 4。

表 4 回民战争及 1959-1961 年大饥荒中甘肃分府人口死亡数及比例（%）

府名	1861年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比例	排序1	1958 年人口	死亡比例	排序2	排序1+2
泾州	92.8	69.3	74.7	6	66.6	10.8	2	8
平凉府	281.2	249.1	88.6	3	81.3	3.2	8	11
庆阳府	141.0	128.7	91.3	1	82.4	0	13	14
宁夏府	166.9	149.9	89.8	2	105.4	2.5	12	14
巩昌府	209.9	134.0	63.8	9	209.0	9.0	4	13
秦州	96.3	3.0	3.1	12	171.5	15.2	1	13
阶州	42.0	-5.1	-12.1	13	82.8	10.7	3	16
兰州府	298.5	210.4	70.5	8	95.4	5.3	6	14
西宁府	81.5	55.1	67.6	10	150.8	6.5	5	15



凉州府	166.6	120.8	72.5	7	138.5	3.1	9	16
甘州府	100.0	81.2	81.2	4	56.1	3.0	10	14
肃州	50.0	38.4	76.8	5	43.8	2.7	11	16
安西州	8.6	5.0	58.1	11	10.4	5.1	7	18

资料来源：同表 3。

最典型的是庆阳府和宁夏府，回民战争中的人口死亡最多，1959-1961 年中人口死亡最少甚至无死亡。秦州和阶州人口死亡最少。1959-1961 年秦州和阶州的死亡人口比例分别占第一和第三位。一百年前受战争破坏较轻或未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一百年后的饥荒程度最为严重。只有泾州例外，回民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高达 74.7%，位居第六，1959-1961 年人口死亡比例仍高达 10.8%，位居第二。泾州辖县少，范围小，这一特例尚不足以推翻本文的结论。对甘肃各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分别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皆呈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为-0.78 和-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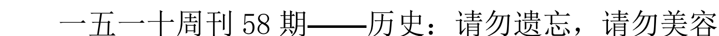
表5　河南、湖南两省两次大灾中的人口死亡与1953年人均粮食

粮食：斤

死亡人口占灾前比例（%）			1953年	死亡人口占灾前比例（%）			1953年
河南	1851-80	1959-61	人均粮食	湖南	1851-80	1959-61	人均粮食
彰德府	26.4	1.2	410.1	长沙府	-18.9	11.9	631.5
卫辉府	31.1	2.2	453.1	衡州府	13.8	5.3	699.4
怀庆府	25.5	4.1	397.5	宝庆府	-11.8	3.9	496.6
开封府	31.5	1.9	321.5	岳州府	36.7	2.3	842.7
河南府	12.7	0.6	334.6	常德府	-14.9	3..3	892.1
陕州	35.8	0.3	453.2	澧州	-21.0	4.3	849.4
汝州	16.2	1.6	340.3	永州府	-13.9	7.1	639.2
许州	23.6	1.1	358.3	郴州	17.3	0.6	627.1
归德府	25.8	9.2	411.8	桂阳州	17.3	2.1	615.6
陈州府	31.6	6.4	396.0	永顺府	-6.8	9.7	642.4
汝宁府	-8.0	10.5	490.7	湘西四厅	-79.4	11.3	671.6
光州	-7.8	21.3	433.4	靖州	22.0	2.3	663.3
南阳府	-9.7	7.5	403.2	辰州府	-5.4	4.3	614.3
				沅州府	-3.4	6.8	701.9

资料来源：同表3。



再以河南、湖南为例。湖南若干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死亡，河南中部和北部则遭遇 19 世纪下半叶大旱灾的打击，人口死亡甚多。两个时期人口死亡程度的关系呈中等负相关（r 值分别为-0.665 和-0.734）。河南省在 1876-1878 年的大旱灾中，大约有 748 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然位于豫南地区的光州、汝宁和南阳三府州，不受影响。在三年大饥荒中，光州、汝宁两地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比例的排序，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南阳居第四。只有归德府和陈州府境有些例外。原因不明。在湖南，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较为严重的诸府，在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损失较小，反之则大。

为了节省篇幅，兹不拟对其他省进行类似的统计分析。只想罗列以下一些基本的事实。在江苏，据表 1，1959-1961 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最高的地区是扬州府、徐州府和通州。三地则地处长江以北。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的江北大营以扬州为屏障，苏北的大部分地区得以保全，人口持续增长。一个世纪以后，大灾难主要降临在苏北。只不过，在苏北地区扬州、徐州和通州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淮安、海州两府州境人口死亡甚少，其人口死亡比例甚至低于苏南，原因不详。至于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不大的松江府，在三年大饥荒中，属于上海市辖。上海市高效率的食物保障体系，应是松江府境诸县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

陕西的情况相同。回民战争和大旱灾结束以后，关中地区（西安府、同州府和鄜州）死亡人口占战前总人口的 45.8%，陕南地区（汉中府、兴安府和商州）占 25.3%，关中以西的凤翔府、邠州、干州合计占 23.5%。在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和凤翔府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占灾前人口的 3.6%。其它地区几无人口非正常死亡。在灾区四府中，凤翔府人口死亡较少。这也与 1928-1930 年的大旱灾中凤翔府境也是重灾区有关。

4、历史记忆：对人口死亡成因的新认识

综上所述，两个时代各省分府人口死亡资料似乎在向人们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人口的积累与人口的死亡相互关联：出生即意味着死亡，死亡亦意味着出生。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死亡的两次大悲剧之间，难道真的存在某种宿命的联系？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曾设提出这样一种假设：19 世纪下半叶的战争与饥荒，造成了若干地区严重的人口死亡。人口死亡又造成人地关系的宽松，最终导致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的增加。当新的灾难降临之时，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多的地区，其化解灾难的能



力明显强于那些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少的地区。按照我对江西、陕西等地情况的了解，我对这一假设颇有信心。

然而，这一假设未能得到有效的证明。1958 年的疯狂使得人们不敢相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在一项其它的研究中，我曾从各省档案馆搜集 1953 年全国分省各县耕地数、各类粮食产量数，以此求得分省各“府”人均拥有的粮食数。从 1953 年至 1958 年，中国的农业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假定 5 年间各地粮食亩产量的提高幅度大体一致，那么，1953 年各地人均拥有的粮食量的多少可以看作各地人均拥有的资源量的多少，至少在区域比较的意义上更是如此，只有在一些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外。

表 2 列出各省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并进行排序，将这一排序与人口死亡比例排序进行对比，可见人均拥有粮食最多江西人口死亡较少，但人均拥有粮食量位居第二、第三的四川和湖南，人口死亡比例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安徽、云南因数据不全不计）。不仅如此，人均粮食拥有量排名第 12 位的山西省，死亡人口比例位居最后。这三个农业大省的例子几乎可以让人产生错觉：人均粮食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人口死亡最多，反之则最少。这一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表 2 中所列 1953 年各省人均拥有粮食和 1959-1961 年各省人口死亡比例这两个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也对各省人均拥有粮食的排序及各省人口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皆无相关（r 值分别为 0.035 和-0.015）。即使排除城市人口众多的河北（含北京和天津两市），结果相同（r 值分别为-0.099 和-0.142）。

以府级政区为单位，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与人口死亡比例之间也没有关系。兹以人口死亡较多的河南、湖南两省为例，人均粮食与人口死亡比例分别见表 5。计算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两省人口死亡率与 1953 年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并无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43 和-0.092）。对贵州、广西两个未遭受 19 世纪大灾难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可以同样证明这一点（r 值分别为-.09、0.021）。这一分析的基础是，大饥荒时代，粮食的流动方向是按照行政等级垂直进行的，很少见有区域之间的水平流动。

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在河南，人口死亡最多的汝宁府境（信阳地区的一部分），1953 年人均粮食最多。当河南信阳地区的国家粮库囤满粮食，而信阳的老百姓却在大批饿死的时候，一个地区较高的粮食总产量或较高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能说明什么问题？



同样是农业大省，四川人口的死亡水平大大高于湖南，更高于江西。同样是安徽灾区，徽州府境人均拥有粮食最少，而该地人口死亡最少。在这些农业大省，无论以省级政区还是以府级政区为单位进行计算，区域之间的人口死亡水平差异很大，且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毫无关系。当然，这一论述并非对林毅夫和杨涛观点全面否定，而是说，采用户籍分类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采用区域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观点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1958 年，当大跃进狂飙骤起、浮夸风甚嚣尘上之时，各地政府均承受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巨大政治压力。从理论上说，各省承受的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是相同或相近的。在一个省区之内，各地承受的来自省级政府的压力也是相同或相近的。同样的推理可以一直落实到县一级和乡一级。问题在于，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下，各地灾情何以不同？上文证明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市人口的比例对于人口死亡率几乎不产生影响，而人均拥有粮食的数量也与人口死亡率无关。那么，我们必须寻找其它的原因。

就历史过程而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亩产的虚夸导致政府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当农民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完成征购时，政府通过“反瞒产”运动强行夺走农民的口粮，最终导致饥民的大量死亡。各地虚夸的幅度不一，导致各地粮食征购程度的轻重不一，也导致对于瞒产的认识不一，更导致征购农民口粮食的力度不一，最终导致农民死亡程度的不一。现在的问题是，何以有些地区产量大大高估，地方干部对于农民视如草芥，另一些地区却并非如此。为此，我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作为主要的解释工具。所谓“历史记忆”，这里指的是深藏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历史时期灾害事件的记忆以及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这一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各地的灾情以及人口死亡的程度。在这一解释中，大饥荒的历史循着以下模式展开：

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1958 年，各地承受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在经历过大饥荒的地区，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不仅民间百姓如此，地方基层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地区，很少出现粮食亩产量的大浮夸，即使虚夸，幅度也有限。民间百姓对于粮食的高度重视，来源于对于大饥荒的记忆。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人民尚能依赖粮食而存活。另外，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化直至消失，直至灾难降临，记忆重新获得、加强又至消失。当大饥荒没有得到人类智能的理性对待时，同样的灾难具有重复出现的特征。

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证明。例如，我们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人口较之其它地区的人口更珍惜粮食，并有一套应付饥荒的办法。例如，我们还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地方基层干部或高级干部，较之其它地区的干部更尊重民情，更愿意倾听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份，地方干部作为民意的代表，有一套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付中央的指令。但是，我们还不敢说，早在 1958 年，地方利益已经成为地方干部行政决策的出发点。

至此，有关 1959-1961 年大饥荒的主题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需要探讨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在那些人口大量死亡的重灾区，幸存的人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只不过，关于大饥荒中人口如何生存，将是另一部著作的主题。

（曹树基，历史学博士，现担任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人口史。参与编写《中国人口史》。原文刊载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 1 期，第 14-28 页。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5/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

【返回目录】

本部分延伸阅读：

陈子明：真相的遮蔽与还原

文章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927.html

（陈子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特约作者。）

【忆】

10-3 茅于轼：我在 60 年代的挨饿经历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1960 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 10 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 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 12 口人，只剩一个人。当时他十几岁冬天冻得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声声说百姓有的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



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 11 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没有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挨饿时的心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最高兴的是能够吃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有没有这种机会？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车，按规定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供应 4 两粮食

的食品。一般是两个火烧或面包。再有就是有特权的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有机会吃不要粮票的饭。那时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带粮票，或者自带干粮，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原文选自《无悔的历程》，2010 年 10 月出版。原文链接：http://maoyushi.i.sohu.com/blog/view/214267287.htm）

【返回目录】

10-4 杨继绳：永久的墓碑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注：本文为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一书前言。作者曾长期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记者良知，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大跃进饥荒这段惨绝人寰的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说明，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千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作者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8 年 5 月出版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 1959 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 3600 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 年 4 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 3 天，取出了 3 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

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 1889 年（光绪 15 年）农历 6 月 6 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 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冲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 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 12 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 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 20 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 10 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 10 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 7 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 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 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

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 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 年 10 月 1 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 50 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 1950 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 1954 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

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 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



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 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 50 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 年 5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 年 8 月到 12 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 20 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 30 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

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 1989 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 1958 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 22 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 1958 年到 1962 年期间，中国饿死 3600 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 4000 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 7600 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 4000 万人，饿死 3600 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 1945 年 8 月 9 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 450 倍。①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 450 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颗原子弹中较大的一颗。

这个数字相当于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的 150 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 150 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 1914－1918 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 200 万人。中国 1960 年一年就饿死 1500 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③。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 3600 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 1928－1930 年全国 22 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 1000 万人。从 1920 年到 1936 年，17 年灾荒合计死亡 1836 万人④。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 年的死亡人数不到 600 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 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 14 万。1958-1962 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 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 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

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 85 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 1965 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 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 20 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 10 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1962 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 40 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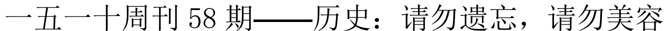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 1958 年至 1961 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





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等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 1958 年至 1961 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⑦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



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 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1955 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 1956 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1956 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 恩 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 恩 来差一点丢了官。1958 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1958 年底到 1959 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 1958 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拚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 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1 1958 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1958 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 1958 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 1960 年 10 月 15 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 2104 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 254 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 17 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 16 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 1961 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 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 12000 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 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 1958

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注释

[1]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 71000 人，8 月 9 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 80000 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 24 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下册，第 427 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北京，第 142-143 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0 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 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 年第 2 期(总第 69 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1 月 27 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年，第 441－442 页

（杨继绳，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原文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序言。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5/杨继绳：永久的墓碑/）

【返回目录】



【论】

10-5 孟雷：以私人记忆守护历史神祠

“无人能置身事外，即便四十岁以下的人，请问问你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曾生活在那时的农村，他们大多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榆树皮、红薯叶磨的粉、草根乃至观音土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人是怎样浮肿得像个吃饱的大肚汉，然后突然倒下去。甚至，可能还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作为史学家，记录下只有你一人能够获知的历史，我们该去做这件事。”



幸好，我们中国人是有着著“私史”的坚韧传统的。

2005 年的时候，为给鄙报写文章纪念顾准，我查阅了他的日记。那年是顾准冥诞 90 周年，他是提出中国应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第一人，屡受迫害，蒙冤亡故。但最震动我的，并非他对经济、政治、法律的精深探究，而是他作为“右派分子”在河南信阳地区“劳动改造”时，记录下的饥馑惨状——触目可见的老百姓大规模浮肿、饿死，以及“人相食”。有个男人杀了老婆，有个姑姑吃了小侄女；更多埋得浅的新亡者，则被很快从地下掘出分食。

现在已知的统计资料，从 1959 年秋天到 1960 年的春夏，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地区，饿死一百万人口。有的是一家人乃至整个村子灭绝了人烟，因有严令不得放农民外出逃荒。这个地区，正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

饿殍盈路，哀鸿遍野，何止河南，何止信阳。

那是一个被巫术和谎言笼罩的黑暗年代。伴随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咒语，粮食从起初“亩产万斤”的试探，飞快攀升到“亩产十万斤”，这样的“放卫星”，将得到丰厚的政治犒赏。

那是一个被狂热和愚昧所控制的社会。“十年赶英超美”计划，“钢铁元帅升帐”，人民被强制动员起来大炼钢铁。饭锅、菜刀熔化进遍布城乡的“小、土、群”高炉——他们被告知



大食堂的饭永远吃不完，不必再保留这类家什——炼成一无所用的废铁。而农民为完成这个任务，被命令放弃收割和播种。

那是一个人被掷做试验品的残酷时光。“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在土改后分到手没有几年的土地，被迅速收缴，成为“社员”，编入小队、大队、公社，不再能为自家耕种、收获，他们从自由民被改造为农奴。公粮按照“放卫星”数字催征，农民没了口粮和种子。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此时开始显现它冷酷的威力，死镰像在收割麦田，一刀划过就是一捆。这只是大饥馑的开始，接下来还有若干年，其中最难熬的三年，起初被伪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再然后，改为“三年困难时期”。

这就是那段历史。

“正史”曾对它长期否认或回避，但它仍坚韧地通过两代人的口耳，通过顾准这样的私人笔记，通过《墓碑》、《夹边沟记事》这样的私人著作在保存、流传。零散的萤光汇聚成川，直到虽仍有所遮掩回护，但正史也再不能对它视若无睹。去年初，反复编纂 16 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写下了仅从 1959 到 1960 的一年间，就已有“非正常死亡 1000 万人”的话。虽对三年中横死于饥饿的总人口数，仍姑付阙如，但已是个进步。在 1997 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的报告，则把这个三年数字记录为 2200 万人。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空白总会被填上，只要我们仍留着对惨祸的记忆，仍存着对历史敬畏之心。但这或许不够，不仅是数字，我们该记住的，是那些个具体的人。

这是一块仍在渗血的厚痂，久已不被触及。因为一旦揭起，整个社会的神经都会抽搐痛楚——无人能置身事外，即便四十岁以下的人，请问问你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曾生活在那时的农村，他们大多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榆树皮、红薯叶磨的粉、草根乃至观音土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人是怎样浮肿得像个吃饱的大肚汉，然后突然倒下去。甚至，可能还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作为史学家，记录下只有你一人能够获知的历史，我们该去做这件事。

重新发掘这段历史，会是一个痛楚的事情，但可能不得不做，因为总有心怀险恶者或无知的愚氓，不断在用谎言去粉饰遮盖谎言，用谎言的刀剑挑战社会的底线，践踏人类的和历史的

良知。他们知道，善良的人哪里痛。所以，那就揭开吧，虽然痛，但我们自己来。让这个历史中的病灶彻底暴露于阳光之下，或许这正是治愈它的时机。具体的、一个个的逝去者，会跟仍在糟践和无视他们的险恶者平静对视，会给无知者揭示真相和道理，然后才能得以真正的安息，随历史的长河而去。

自鸿蒙初开，太古以来，历史就是中国人的神。虽然祂的真相往往长期被湮没，被伪造，被强暴，但它仍兀自不死。这段历史也是活着的。当不绝如缕的私人记忆被发掘，一个个尘封的名字被唤醒，它们就终将汇入大历史的神祠，成为无比坚固的整体，守卫历史，并被历史所守卫。无论是谁，也无法再欺蒙和摧毁。

（孟雷，《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原文刊载于《经济观察报》。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507/225999.shtml)

【返回目录】



10-6 朱大可：民族失忆与新记忆运动



“基于‘国家记忆’的严重障碍，‘私人记忆’近来开始盛行起来。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杨绛《我们仨》、胡兰成《今生今世》，到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等等，这些‘私人记忆’突然从历史性昏睡中苏醒，变得生气勃勃，成为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它们要取代‘国家记忆’的权威地位，向我们诉说已经蒸发了的近现代史真相。”

“国家失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中国一方面是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拥有最发达的记忆载体，但另一方面却丧失了对重要历史真相的记忆。文革终结仅仅 30 年，大量血腥事实已被时间抹除，甚至发生在 1976 年的“四五运动”也悄然淡出了历史。政治性遗忘像 SARS 一样四处传染，疏离着我们与历史的密切关系。而在记忆溃烂了之后，一些新左知识分子，却利用了这种文化失忆效应，他们以文革话语制造革命幻象，尽情诱发着“愤青”的话语暴力。这个事例从反面证实了“国家失忆”的重大效用。

“国家失忆”是意识形态管理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在官方史学家们修史的同时，档案遭到了彻底的尘封。迄今为止，各级档案馆仍然以所谓“国家机密”的理由拒绝对个人开放。查阅者必须出示“介绍信”和确认政治身份后才能阅读少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旧报刊和旧卷宗都被封存起来，仿佛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阴谋。令人庆幸的是，对它们的解密正在缓慢起步，向我们呈示了一种修复失忆的希望，尽管它还远远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

基于“国家记忆”的严重障碍，“私人记忆”近来开始盛行起来。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杨绛《我们仨》、胡兰成《今生今世》，到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等等，这些“私人记忆”突然从历史性昏睡中苏醒，变得生气勃勃，

成为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它们要取代“国家记忆”的权威地位，向我们诉说已经蒸发了的近现代史真相。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私人记忆”：邱吉尔式的历史记忆和普鲁斯特式的文学记忆。前者是一种纯粹理性回顾，而后者总是洋溢着感伤而忧郁的怀旧气质，令记忆获得一种美学的品质。七十年代风靡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就是私人记忆美学化的一个文学范例，它在“创伤记忆”中从事有关恋母情结的叙事，最终在张贤亮“知识分子原罪”的忏悔和自虐中达到高潮。

尽管章诒和、杨绛和胡兰成的记忆属于非虚构性文本，但它们都具备了“作家记忆”的基本属性。他们奋力书写着在个人情感经验中扭曲变形的真相，企图影响他人对历史的基本判断。维特根斯坦早已断言，话语中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记忆就是流传在本人内心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在权力社会中书写往事，就是利用“回忆”来获得对历史的阐释权。回忆者从私人角度辛勤地改造着历史，令其散发出化妆品般的杳远香气。

而历史记忆还有另一种功能，它与司马迁的悲痛事迹相关。近 2000 年前，汉武帝对史官的阉割反而激发出一种卓越的记忆力，并且点燃了前所未有的书写激情。这是一种罕见的精神剧变：宫刑竟然成了冲锋的信号，它逼迫人起身，用书写历史去反抗专制者的王国。但这种反抗并非要在行文中直接谴责当朝君主的暴政，而是要充分展示记忆的魔法力量：他在竹简上奋笔疾书，不倦地讴歌皇帝的功绩，判处皇帝和历史一起永生。而汉武帝并未意识到这点。他到处寻找丹药，谋求永生，却对史官所赋予的不朽生命置若罔闻。

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书写记忆的极端事例。它同时显示了官方知识分子记忆的弊端：修史者即使严重受辱，其灵魂也必须统一在君主的意志之中。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民间口述历史的运动开始悄然掀起，它要从另一个更加质朴和纯粹的角度招回历史真相。在影像记忆方面，吴文光和蒋樾等人的个人纪录片开拓了数码空间，但它们随后就被大批电视台的“讲述”栏目所仿效，后者不过是纪录片的廉价代用品。

而在纸媒记忆方面，中国青年出版社《看看他们——北京 100 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无疑是社会学研究的范例，但这种口述历史随即被官方史学所接管，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口述史学”中心，大批口述史学著作呼之欲出，试图据此由“伪史”向“信史”飞跃。这场“新记忆运动”提供了重构记忆的重大契机，但以上的大量事例也表明，“国家记忆”正在

征用“私人记忆”和“民间记忆”，来改变其“失忆”容貌，并最终达成支配“人民记忆”的宏大目标。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原文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04 年 43 期。原文链接：http://zhudake.blog.caixin.com/archives/29114）

【返回目录】

10-7 刘瑜 郭于华 王晓渔 熊培云：历史遗忘与记忆美容





“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普通人历史的权利，他们是历史的主体，也应该是讲述的主体，这个当中其实是有一个权利的。所以我一直想说，包括每一个普通人，王晓渔意义上的底层，我们应该像爱护我们的房产，爱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的爱护和保卫我们历史的权利，我们讲述的权利。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而且能够去做的。因为我们想大多数人都是有这种历史的能力，我们可以写作，我们可以记录，我们可以讲述自己的历史，我们比最普通的农民和农妇更有能力。这方面我想我们也应该去实现历史的权利。”

王晓渔：今天我们讨论的书和话题是这么一本书——《倾听底层》。我个人挺不喜欢听关怀底层的话题，因为很多学者经常说要关怀底 层，仿佛他们自己不是底层。至少我觉得我就是底层，要关怀底层我首先要关怀一下我自己。

一讲底层容易把它道德化、神圣化，这本《倾听底层》纠正了很多对底层的既有观念，呈现出很多面相，我们请郭老师讲一下如何倾听底层。

郭于华：我们就是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

郭于华：非常感谢网易读书做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也非常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活动的主办，我也特别感谢各位用周末的时间来做这样一个非常自由的、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的交流当中有所学习，有所收获，这本书是关于社会记忆的。我首先想从社会记忆这个事来说几句。为什么我们对 社会记忆这么看重？我们一直在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如果一个健忘的民族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前景。我这里面会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社会记忆？人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历史的 主体，这个问题说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历史的现实，我们其实知道这个话不是废话。因为在我们正式的、官方的、正统的历史当中往往 是看不到人的，特别是看不到普通人，看不到我们作为公众、作为大众的普通人的。这种历史都是很宏大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也是伟人的历史、名人 的历史、军事家的历史、政治家的历史，但是就是没有普通人的历史。普通人在历史当中，往往只能作为数字而存在，比如什么什么样的战争，消灭了多少多少人或者是俘虏了多少人，或者什么样的时代人口减少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人，可能是作为数字存在的。

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销声匿迹的，他们既没有形象，没有面目，也发不出声音，所以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记忆的重要性就非常凸显。

再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前人的历史，了解这些历史当中人们的功过，特别是要明辨是非，这一点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我们作为后人，大家一句常说的话，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社会当中，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很多不该被遗忘的事情遗忘了，很多不该被丢弃的事情丢弃了， 这也是我们说社会记忆重要性一个方面。

再有一方面，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或者叫集体记忆，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的、理性的源泉。如果我们说语言是思维的要素，记忆，或者记录下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进行思考，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的一个必要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怎么以史为鉴呢？怎么样对历史进行分析、进行反思、进行对比？我 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所以如果说通过某一种权力的技术，把这个记忆控制了，把历史控制了，这个思想的源泉就断了，思想之流就会干涸，这也是我们强调记忆非常必要的另一个方面。

再有一个，刚才提到的批评的问题，批评的尺度和批评的自由的问题。历史同样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会对权力形成制约，对统治者有所约束。可能这 一点大家都不难理解，我们看一看历史，你会发现统治者，尤其是暴君都有一种对历史的惧怕，他可能不怕天、不怕地，我手里有很强的权力，我怕谁啊？但是很多人惧怕历史，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所作所为在历史上作为证据、作为罪证来存在，他们很多时候的做法，去修改历史、剿灭记忆，实际上也是出于 恐惧。赶尽杀绝是出于巨大的恐惧，因为害怕在人民口耳相传的口碑当中、在历史当中遗臭万年，记忆和历史是具有这样非凡的意义和作用的。

我们说到历史和权力的关系，其实历史也是权力的产物。大家都知道历史并不是一个已经可能存在在那儿，等着我们历史学家也好，等着研究者也好，等着读 者去发现和挖掘这个历史。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历史是建构的产物，记录历史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这个建构的过程又是由权力来主导和控制的，这一点可能大家都会非常熟悉，比如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描述了这样一个国度，这样的国度当中，历史记录被不断修改，报刊杂志的文章被不断地修改，实际上你会发现，历史被抹掉了，抹掉这个过程又被大家遗忘了。于是乎，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所以奥威尔说："这个历史像什么？就像一个在羊皮纸上不断被刮干净再重写的东西"。他还说到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接下来一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非常经典地概括了权力 和历史的关系，作为非常重要的权力技术就是对人们记忆的控制，对人们记忆的扭曲和改变。

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现实的，我在村庄当中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案例。我在陕北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已经是历史文化名村，1947年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时候，11月22日转战陕北过程当中，为了躲避胡宗南的围剿到这个村子来了，住到了1948年3月21号，将近四个月时间。毛泽东在这儿写下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一系列40多篇文章，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使这个村庄的历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村庄之前是有大的、非常富有的大户人 家，大的宗族在这儿居住，他们在这个村庄当中经营了上百年，好几代人了，可能有400年的历史。

这个村庄当中修建了非常好的窑洞，被称为陕北窑洞建筑经典，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窑洞设计者是当时同济大学毕业又留学日本的马氏家族的后人。窑洞修好以后，还没有来得及住，给这个窑洞取了一个名字叫"新院"，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入住了"新院"，在这儿呆了四个月。于是这里变成了革命遗址，变成毛泽东转战陕北纪念馆，"新院"改名叫"旧居"，因为是毛泽东的旧居。所以在这儿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换，"新院"是怎么变成"旧居"的？

进而我们还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普通人，特别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这个社会的底层究竟能不能讲述自己的历史？究竟能不能在历史当中发出他们的声音？这 是我们研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经常持一个批评态度说，我们这个民族本来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文明历史，但是我们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健忘的民族，很多不该忘记的都忘记了，60年前的事情我们忘记了，土改是怎么回事？大饥荒的历史我们也不清楚，40年前的历史我们就清楚吗？



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发生这样的遗忘，我们就要想到，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民族就是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遗忘是如何发生的？可以想到大概这么几个方 式，一个是经常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向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向前看，前方的前也是前，金钱的钱也是钱，我们就看看前面、现实物质的利益，这是很有意识地让我们遗忘。

还有一种方法是"不争论"，是一种搁置，没弄清楚的东西也不讨论、也不争论，就把它搁置起来，但是搁置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就消失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青春无悔"。尤其是很多人在回顾到老三届知青那一代人的时候经常用这个词，"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们要看什么样的人来说这句话，那是一代人，老三届是整个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生命，甚至不止他们一代人，他们的生命历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其实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的。这么一段沉重的，非常厚重，非常沉重的历史，岂能是"青春无悔"这么轻飘飘就说过去了，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苦难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为人生的财富？如果你都把它忘记了，如果这个苦难我们都没弄清楚是什么造成的苦难，根源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何以能够成为财富？所以这样的说法，我们只要稍微去思考一下，去反思一下，我们知道其实都是很难成立的，是不应该这样去说的。

接下来我想进行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探讨：关于个体与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研究当中也碰到这样的现象，也有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事，普通人的历史、大众的经历，哪怕是很苦难的经历，包括刚才谈到的夹边沟的事情。人们会说这些历史都是很无足轻重的，好象是很片断、很碎片，因为这些存在就是非常微弱的、非常卑微的一种存在。我们调查研究当中应经常遇到这样的讲述者，比如说你跟他谈话，了解他的经历，了解他的过去，当事人很多人就会说，你了解这个干什么？没意思，自己就把自己作为历史主人这个事就否定了，他觉得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吗？觉得这个很轻微、很琐碎、很片断。

这个时候我们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个体和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这种个体生命的经历，生活的经历，生活当中所遭遇的这一切，和一个更为宏大的 社会历史结构，以及这个历史结构的转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这儿实际上我们想说的是，其实社会记忆也好，集体记忆也好，其实是要通过个体的记忆来呈现的。个体的一种记忆，其实能够构成社会记忆重要内容。个体跟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他们个体的遭遇和宏大历史进程本身就是血肉相连的关系。

如果说眼前最明显的例子，很多人会说，今天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很多地方发生了企业的转制转轨，很多人失业下岗了。很多人经历了这个过程，很多家庭经历了这个过程，这个无疑

是大的社会转型造成的，你不能把失业下岗的原因归结为个人，说这些人文化程度低，这些人技术水平落后了，不能做这样的归因。因为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和秩序发生整体性转变，或者整体性衰败的时候，失业就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

战争也是同样。当一个战争是一个国家的体系，或者全球体系发生了这样的矛盾，这样变化的时候，产生的一系列困扰都不是个人所能解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需要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在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这样一种联系，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洞穿社会历史结构的眼光。

所以在这儿我们会涉及到普通人历史的权利和历史的责任，也是我今天想要归结和概括的话题。如果我们个体的遭遇，个体的经历讲述能够进入到历史当中，能够进入到公共领域，或者进入到公众视野当中，他的意义就能够体现出来。就像我们说这种苦难，也是今天屡屡提到的话题。

这个苦难如果仅仅局限在个体的层面、家庭的层面，或者说一个小的范围内，它可能就是那样的很不起眼，很微不足道地存在着，或者是被遗忘。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在一个历史的大潮当中消失地无影无踪，这就是普通人的历史命运，他们命定就这样消失掉了。但是如果他能够进入到公共的层面，意义就是非凡的，因为每个普通人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是血肉相连的、情感相系的，我们都在经历这一切，我们都在体验这一切。所以我说苦难，包括刚才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苦难唯有进入了历史，才会具有一种历史的力量，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一种历史的力量，令统治者惧怕的力量。如果苦难不进入历史，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能够进入历史，能够被讲述、被倾听、被记忆，乃至于被研究和分析，就会具有这样一种历史的力量。而我们为苦难，为许许多多人的苦难去发掘它的社会根源，去找到造成苦难的原因，苦难就会具有一种社会的力量。

同样，如果说苦难能够超越那种带有宿命论色彩、先赋性局限的话，比如说我们跟农民进行交谈的时候，我经常能听到这样的，给苦难做一个归归。他们会说没办法，就是命苦，谁让我生在农村了，谁让我是一个农民了，谁让我是一个农村的妇女了，我就是这个命，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农民嘛，就那么个"，我就是命苦，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宿命。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倾听、讲述、研究，去超越这样一种宿命论的话，苦难应该具有一种解释的力量，具有一种重构的力量，具有一种 获得解放的力量。

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简单地说一下，一会儿还会有各位评委的观点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熊培云：社会的苦难是所有人参与的

王晓渔：我也非常有共鸣，几乎我们从中学到最后读大学，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从自学国史和自学党史开始的，都是恢复对历史的记忆，恢复对历史的了解。刚才还谈了很多对苦难的态度，比如“青春无悔”。

我读书经常会走神，包括读郭老师的书。书里有一段，女性讲述当时的历史，一方面是女性对当年合作社前后的历史有很多痛苦的记忆，包括个人甚至因为生育所产生的身体不方便的时候 都要去劳动。另外一方面，又是感觉很美好的，老是用一个词，红火，那段时间非常美好。郭老师在里面分析，其实是一个社会设定的逻辑变成了一个自然的逻辑， 竟然达到这个程度，一边觉得很痛苦，一边觉得很美好，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看到这儿我经常想起前不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不这么叫，我觉得北欧没这么 奇怪，我称之为“洛阳综合症”。洛阳前不久有一个地窖，一个男子在地下室里挖一个地窖，几个女子囚禁在里面，好不容易把女子救出来，吃惊的发现，这几名女子在几年里面像争宠一样，跟着老大，希望绑架她们的男子宠幸她们，其中因为争风吃醋，有一个女子被杀死了。

我经常会跑题，从讲述自己 的记忆跑到洛阳这儿来了。接下来有请刘瑜小姐和熊培云先生，这两位不需要我太多的介绍，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上课的时候经常发现同学偷偷看书，一看《自由在高处》、《民主的 细节》，我本来想批评他们的，后来一看，觉得非常好，可以不听我的课，但是一定要看他们的书。包括我到万圣去，万圣书店的饮料单用书的名字，我经常点一杯 《自由在高处》、《民主的细节》。《民主的细节》好象是一杯姜茶，今年年初我来北京有点感冒，连点了两杯《民主的细节》，感冒就治好了，接下来有请刘瑜小姐 讲讲治疗感冒的配方，我们恢复记忆的配方。

刘瑜：谢谢晓渔的介绍，我没想到书可以以杯来计了。刚才听到郭老师的讲解还有王晓渔的介绍，我也是觉得，其实现在关于所谓的社会记忆，或者集体记忆的问题，其实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郭老师讲到的这种集体性的遗忘，组织化制度化的遗忘。现在打开电视，有很多关于民国时期的碟战片，再换一个台，看到《还珠格格》，再往前看还有《舞林外传》，再换一个台《乡村爱情故事》，《奋斗》……恰恰在有一个阶段，1949到1976， 离我们生活非常接近的阶段，看到的是雪花点，看不到反映这方面题材的电视。我觉得这是非常奇



怪的现象，这一段的历史，无论就其重要性来说，还是就其惨烈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郭老师书的前半部分就是试图通过底层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部分的历史。

我们其实没有资格遗忘那一段时间的历史，今天很多人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问题是我们有资格遗忘吗？你没有资格对一个被强奸的女性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因为你自己不是受害者，你没有权利对受害者这样说。过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对权利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对尊严的看法都体现在对过去的看法当中。如果对过去的看法没有体现对权利、生命、尊严的尊重，那么这种不尊重必然会体现在现实和未来的看法当中，这个是一脉相承的，记忆有着价值传承的功能。

如果你去美国的话，会看到大屠杀纪念馆，在南京也能看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如果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这些纪念馆都不应该存在。中文里有一个词，实事求是，我们就是要通过对事实的澄清和追问，来追问是非，来了解是非，分清对错，所以抹杀记忆本质就是混淆是非。这种集体性的遗忘不是偶然的，不是每个人的短视和健忘造成的，一定是制度性的障碍使我们忽略和抛弃那段历史。这是关于记忆的一个问题，我读郭老师书的一个感受。

还有一个和这个问题一样严重的是对诠释记忆的垄断，怎么去诠释历史，怎么去理解历史。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当她去乡村底层去走访的时候，了解他们情况的时候就会发现，也许他们并没有忘记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讲述过去历史的时候，完全是以国家的语言，政治化的语言讲述那段时间的历史，已经没有 了个体的，生动的，活泼的个体化的回忆了，个人史实际上成了国家史的微观缩写而已。

我读《翻身》那本书，关于中国土改的书，里面描述的一段细节挺有意思，描述土改队员怎么去动员农民。农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批斗地主：如果我给地主干了一年的活，他没有给我工钱，我可能去批斗他。但是我给他干了一年的活，他按照年初说好的工钱给了我，我为什么还要批斗他？土改队员会跟他说，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东西叫剩余价值，开始讲这个剩余价值，由剩余价值谈到剥削，从此以后农民就有了剥削这个概念。从此以后用一种宏观的，国家化的、政治化的视角去诠释他个人的生活，因此开始像郭老师书里面讲到批斗地主残忍的画面。一旦有了国家的视角，宏观的视角，用它来诠释个人生活，个人记忆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仇恨，开始有了政治斗争等等等等。所以你对记忆的塑造，对记忆的诠释一旦被国家化了，你的整个行为指导方针，对过去的记忆会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被国家化、政治化的记忆和失忆是一样值得警惕的。

刚才郭老师提到《1984》，我也是赞同她对这个的分析，根据现实的需要，过去的历史不断改写。如果今年我在跟大洋国打仗，我就要把过去关于一切大洋国的记忆塑造成大洋国是怎么怎么邪恶的，如果明年跟它和好了，明年关于一切大洋国的历史，都要改写成大洋国是怎么光荣正确的，历史不断的根据现实的需要改写。这个国家，《1984》所在的这个国家，建立在这么一个不断被改写的、流动的历史当中。男主角文森对此感到怀疑，他碰到一个同样怀疑同类的时候，他们俩悄悄在房间里干杯的时候，文森举起杯子对另外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为了过去"，对我来说这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我也愿意把这个画面留给大家去回味、分析和想象。

熊培云：我刚才看这个封面看了很久，王晓渔刚才也说了：倾听底层，我们实际上都是底层。如果是这样的话，倾听底层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倾听，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话讲出来就可以了，因为底层的声音就在我们内心？我不是要批评郭老师，她自己对自己的话做了解释，书也有一个副题：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讲到苦难，我跟郭老师也有很多共鸣。她这本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我最近几年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刚才说苦难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关注底层苦难的时候，找原因的时候，不能说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特别宏大的历史，是它造成的苦难。在我们讲个体苦难的时候，实际上个体也在不断地参与苦难制造。我看这个书后面谈到郭沫若。一个人写了一篇祭文，刘亚洲写的，60年代郭沫若两个儿子相继死掉了，里面有一些个人情感的寄诉，特别悲伤。我们一觉得郭沫若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在毛泽东面前就是底层，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样。讲他如何为自己孩子悲伤的时候，我在评论课上跟学生讲的时候，讲50年代有一本杂志，《新观察》，原来的老《观察》杂志在国民党时刻停刊了，新中国建立之后，重新出了《新观察》。

翻开这个杂志跟40年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讲到这个呢？我在上课的时候专门谈到郭沫若那个时候发表在《观察》上的一首诗：我们高呼万岁，斯大林同 志。为什么讲这个，郭沫若60年代失去了他的儿子，50年代又做了什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又做了什么？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有的人总是说过去不幸的事情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做的。这个话也不公平。为什么这么讲？实际上不断地有人参与到塑造神的过程里面来，郭沫若还有其他很多人。另外一页也谈到老舍投湖的时 候，当时湖上浮的都是老舍记录下来的最高指示，他是带着这个最高指示去投湖的。这些记忆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去看它的时候，而不是一边倒的，只是某一个人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苦难，这是所有人参与的。

原来我在整理农民的一些材料，看原来的一些文件，当时梁漱溟批评对农民的盘剥、奴役的时候，政协开会的时候，很多人批评他是在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觉得他不配和毛泽东争夺，最后大家投票，把他在政协会议上讲话的资格都剥夺了。如果把这些记忆都能恢复起来就知道，实际上在50年代以后，走向悲剧是整个社会参与的；如果说是共谋犯的话，社会也是在其中参与的。

另外就讲我自己的一点，前些日子跟学生讲课的时候谈到“地富反坏右”。很多学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什么意思。我写在黑板上还在问，一个一个解释。 这些都是90后的学生，他们历史遗忘的程度真是让我非常感慨。我解释完了以后，有学生说，那样的时代为了公平起见，要保卫这些国家，把这些清除，建立一个 贱民阶层是可以的。学生问了一句，你说如果不那样做，还能怎么做？这个话让我感觉很奇怪，我就说，你不做了就等于做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一件坏的事情？这个细节我也看到，实际上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面，除了马克思主义，还奉行另外一个主义，“马赛克主义”。我们很多历史被遮蔽了，很多学生不断地在上课、考试，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

我们不断地恢复记忆，恢复个体的记忆。一方面是还历史的债，我们把不该淹没的东西重新找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回到真实的历史，回到理性的层面。刚才郭 老师讲得非常好，讲很多人，讲青春无悔，我们都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反思，或者你受的苦难把它忘掉了，这实际上就是把你的财富扔掉了，如果 你愿意把那个当做财富的话。

整体的感觉，现在很多人在拍电视片也好，写剧本也好，写小说也好，他们对苦难更多只停留在一种审美层面。苦难是审美，不断地审美，强调我们原来过得这么好，我们是在非常美的环境下生活。如果这样对待历史的话，这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我们除了审美以外，人最终还是要回归理性，不断恢复记忆，也是希望这个民族恢复理性的层面。

我不断地回老家去探寻当地的历史，我自己有这么一段感慨：30多岁，走遍世界很多地方，了解了世界许许多多大事小情，但是我对自己家乡的历史却一无 所知。我为此感到非常羞愧。的确，我这三四年不断地回家找到很多故事，可以回溯20世纪的中国历史，通过那个也是可以看到，我们通过个体的记忆，地方的记忆，怎么真正地来构建一个民族的记忆。没有个体的记忆就不可能有集体的记忆，没有地方的记忆也没有国家的记忆。如果倾听底层的话，更多的还是回到个体，回到自身，让每一个人讲述自己的记忆，讲述自己的苦难，谢谢！

郭于华：像爱护我们的房产一样爱护我们的历史权利

王晓渔：非常感谢几位对于这本书的解读，这样讲到底层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我们都是底层，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因为我对底层的界定比书上界定的范围更 加广义一点，我的界定是所有无法享有公民权利的“公民”都是底层，比如我经常说话迟钝一下，我在想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底层呢。

接下来我向郭老师提一点问题。这本书主要是以农民为主，如果我们把底层就视为农民，是不是说明了我们对底层的界定有一定的问题。如果我们谈论50年 代的话，到底谁是底层，我认为“地富反坏右”是底层，他们不享有任何权利。这本书我至少没有看到访问地主——我称之为士绅——或他们的后裔，不知道郭老 师是不是访问的时候也有涉及，只是这本书没有涉及到。

郭于华：我非常同意刚才王晓渔的观点，如果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底层，可能大家都是底层。底层的确是相对的概念。相比较而言，农民一直处在结构的最下层。

我们访谈的那个村子，土改的时候所有的地主全部离开了，一个都没剩下。这些人后来都分布在全世界，因为有非常大的一个家族，而且这个家族有它自己的 祠堂，有它自己的学校。学校从家族的学校变成了公立的学校，培养了很多很不错的人，老师也是外面聘请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注重教育的家族。这些人上完小学以 后，都到大城市上中学，到了北京、上海一带，乃至国外去上大学受更多的教育。今天村民们也会说，人家地主家的后人全部都在外面，一个是分布非常广，全国各 地都有，香港、台湾、美国、法国也有。老乡跟我们介绍，某某的后代当了泰国国家主席的驸马，这是老乡的观念，他娶了泰王国某一个公主，他们也没有这个概 念，就说当了泰国国家主席的驸马。

我们后来还是在北京、在西安，在不同的地方采访到一些地主的后人，想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大概是什么样的，还是做了一些采访，但是这本书当中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刚才几位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一种历史的遮蔽，有一种有害的后果是对人们良知的消灭，这种做法会改变人们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刚才刘瑜说到 剥削的概念怎么产生的，我们在访谈当中屡屡的遇到，这个村子当中土改的时候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把地主的财产都没收了，平均分配给村里的农民。有不止 一家农民不要，拿着土地说，我不要，我

退回去，拿着财产说我不要，我退回去。他们实际上是基于原有的价值判断，他们的说法就是人家有是人家挣下的。

我们访谈地主的后人也说到祖先发家的历史：这个窑洞修得非常好，几百年了今天还在，这个窑洞怎么修起来的呢？他的爷爷非常非常辛苦，这一年下来大概 攒了几吊钱，攒一点钱在炕下面放着，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因为家里添人口了，要新建窑洞，都是很好的石窑，造价比较高，就去修。修着修着没钱了，就放下 吧，这一年下来再攒一点钱再修，一个窑洞修了好多年。可能是五年、十年都不止，才把这个窑洞修起来。这些东西在乡村社会当中，是人们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于 善恶的判断，实际上是在这样的生活世界当中，祖祖辈辈传承的知识和记忆当中形成的。 权力阶层的介入，干预，乃至于强制性的动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 们的价值判断，因为人们发现，财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靠祖祖辈辈的积累，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勤劳，还要精明，还要会算计。今天人们发现，一夜之间，财富就换 了姓了，就不是他的了，一夜之间不是我的东西可以变成我的，这个东西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会是多么的巨大。我们看待权力对历史的干预当中，需要看到更为深 远的社会后果。

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权利问题。以往有很多判断，很多说法，认为底层不能发出声音。有一个底层研究小组，以印度裔学者组成。其中一个著名的女学 者，她曾经有一个判断是，底层发不出声音，当然她的分析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为什么我们强调倾听底层，也有这样的考虑。实际上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他们的历史 权利，他们其实并不是不能讲述，不愿意讲述，并不是。而是以往，他发不出这个声音，也没有人听他们讲述。你研究当中会发现，如果你认真的倾听，跟他做平等 的，非常诚恳的交流，很多东西他们愿意讲述，而且他们记得非常清，非常深刻，会滔滔不绝地讲。只不过他是不能用正统的方式，官方认可的方式跟你讲述，他们 跟你拉家常的时候完全可以讲述。

我们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也是有巨大的困惑，因为你发现你很难跟对方交流，你提的问题人家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有一种情况，中国农村的农民已经被权力技 术规训了半个世纪了，他会知道你想听什么样，他会想象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以往官方来的工作队，调查组，他们都需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我最近刚去的村子里 面，每家都有这么一张卡片，一面是电话号码，另一面是看图学说话。上面说，我们正在进行平安民址的建设，你知不知道有这个活动，回答知道。你对和谐社会的 建设是不是满意，回答满意，你对公检法的基层工作是不是满意，回答满意。都是印好的，教农民这样讲。

农民不愿意说，不愿意讲，是因为没有办法按照官方的方式来讲述，如果你让他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他们是完全可以讲述的。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普通人历史的权利，他们是历史的主体，也应该是讲述的主体，这个当中其实是有一个权利的。所以我一直想说，包括每 一个普通人，王晓渔意义上的底层，我们应该像爱护我们的房产，爱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的爱护和保卫我们历史的权利，我们讲述的权利。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而 且能够去做的。因为我们想大多数人都是有这种历史的能力，我们可以写作，我们可以记录，我们可以讲述自己的历史，我们比最普通的农民和农妇更有能力。这方 面我想我们也应该去实现历史的权利。

郭于华：我非常同意刚才王晓渔的观点，如果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底层，可能大家都是底层。底层的确是相对的概念。相比较而言，农民一直处在结构的最下层。

我们访谈的那个村子，土改的时候所有的地主全部离开了，一个都没剩下。这些人后来都分布在全世界，因为有非常大的一个家族，而且这个家族有它自己的祠堂，有它自己的学校。学校从家族的学校变成了公立的学校，培养了很多很不错的人，老师也是外面聘请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注重教育的家族。这些人上完小学以后，都到大城市上中学，到了北京、上海一带，乃至国外去上大学受更多的教育。今天村民们也会说，人家地主家的后人全部都在外面，一个是分布非常广，全国各地都有，香港、台湾、美国、法国也有。老乡跟我们介绍，某某的后代当了泰国国家主席的驸马。这是老乡的观念，他娶了泰王国某一个公主，他们也没有这个概念，就说当了泰国国家主席的驸马。

我们后来还是在北京、在西安，在不同的地方采访到一些地主的后人，想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大概是什么样的；还是做了一些采访，但是这本书当中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刚才几位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一种历史的遮蔽，有一种有害的后果是对人们良知的消灭，这种做法会改变人们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刚才刘瑜说到“剥削的概念怎么产生的”。我们在访谈当中屡屡地遇到，这个村子当中土改的时候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把地主的财产都没收了，平均分配给村里的农民。有不止 一家农民不要，拿着土地说，我不要，我退回去。拿着财产说我不要，我退回去。他们实际上是基于原有的价值判断，他们的说法就是“人家有是人家挣下的”。

我们访谈地主的后人也说到祖先发家的历史。这个窑洞修得非常好，几百年了今天还在，这个窑洞怎么修起来的呢？他的爷爷非常非常辛苦，这一年下来大概 攒了几吊钱，攒一点钱在炕下面放着，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因为家里添人口了，要新建窑洞，都是很好的石窑，造价

比较高，就去修。修着修着没钱了，就放下吧，这一年下来再攒一点钱再修。一个窑洞修了好多年，可能是五年、十年都不止，才把这个窑洞修起来。这些东西在乡村社会当中，是人们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实际上是在这样的生活世界当中，祖祖辈辈传承的知识和记忆当中形成的。权力阶层的介入、干预，乃至于强制性的动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价值判断，因为人们发现，财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靠祖祖辈辈的积累，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勤劳，还要精明，还要会算计。今天人们发现，一夜之间，财富就换了姓了，就不是他的了，一夜之间不是我的东西可以变成我的。这个东西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会是多么的巨大。我们看待权力对历史的干预当中，需要看到更为深远的社会后果。

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权利问题。以往有很多判断，很多说法，认为底层不能发出声音。有一个底层研究小组，以印度裔学者为主组成。其中一个著名的女学者斯皮瓦克，她曾经有一个判断是：底层发不出声音。当然她的分析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为什么我们强调倾听底层？也有这样的考虑。实际上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他们的历史 权利，他们其实并不是不能讲述，不愿意讲述，并不是。而是以往他发不出这个声音，也没有人听他们讲述。在研究当中会发现，如果你认真地倾听，跟他做平等的，非常诚恳的交流，很多东西他们愿意讲述，而且他们记得非常清楚，非常深刻，会滔滔不绝地讲。只不过他是不能用正统的方式、官方认可的方式跟你讲述，他们跟你拉家常的时候完全可以讲述。

我们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也是有巨大的困惑，因为你发现你很难跟对方交流，你提的问题人家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有一种情况，中国农村的农民已经被权力技术规训了半个世纪了，他会知道你想听什么样，他会想象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以往官方来的工作队、调查组，他们都需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我最近刚去的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么一张卡片，一面是电话号码，另一面是看图学说话。上面说“我们正在进行平安 XX 的建设，你知不知道有这个活动”，回答“知道”；“你对和谐社会的 建设是不是满意”，回答“满意”；“你对公检法的基层工作是不是满意”，回答“满意”……都是印好的，教农民这样讲。

农民不愿意说、不愿意讲，是因为没有办法按照官方的方式来讲述，如果你让他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他们是完全可以讲述的。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普通人历史的权利，他们是历史的主体，也应该是讲述的主体，这个当中其实是有一个权利的。所以我一直想说，包括每 一个普通人，王晓渔意义上的底层，我们应该像爱护我们的房产、爱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地爱护和保卫我们历史的权利、我们讲述的权利。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而 且能够去做的。因为我们想大多数人都是有这

种历史的能力：我们可以写作，我们可以记录，我们可以讲述自己的历史，我们比最普通的农民和农妇更有能力。这方面我想我们也应该去实现历史的权利。

熊培云：新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打通了三个方面

王晓渔：网络时代给了每个人都发声的可能。刚才说到回答问题有指导答案，非常有意思。其实我在想，选项可以设三个，满意、比较满意和基本满意。保证答案符合要求。最近熊培云有一本讲乡村中国的书，主要是关于当下乡村的状况，能不能介绍一下。

熊培云：我那本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从我老家一棵树开始的。少不更事，总想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不知道内心种下了一颗乡愁的种子，这种子长成了大树。最后有一天来了推土机把这个大树挖掉了，你再回到家乡的时候会痛彻肝肠，很难受。是从这儿开始说的：乡村沦陷了。

我自己一点点梳理，在这个书里有三方面的打通：

一方面是时间的打通，我70年代出生，经历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还有60年，就是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的发展，还有梁漱溟这老一辈人怎么从事乡村建设的。这是时间上的打通，我试图通过时间的梳理，或者按我的方式来解释一下中国的农村史。

另一方面是地理上的打通，我从乡村到城市上大学，再到国外。

第三是写作方法上的打通。通常写作用学术语言，对更多的读者来说，读起来有障碍。我原来是记者，语言叙述上不像学院派，也不是八股。我按我的方式写 作，我一直说寻找我自己的写作方式是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要找适合我来表达的方式。在这个表达的过程中，我就力图将理性的东西和心灵的东西能结合起来；自己内心怎么想的，在这个文章里面表达出来。我自己融入到这个作品里面来，而不止是乡间走访、参与式调查。调查之外我也有自己的记忆，要把这个记忆写出来。

方法上是这样的。具体到内容，涉及到很多。最开始我本来只是想写过去的农民，包括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怎么从乡村走向城市。去年年初《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出来以后，反响也挺好，就觉得放一放，不要这么快出来，大概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我又加了十几万字，包括抗日战争历史的梳理，超出原来我预想的范畴，写的相对来说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多。

在这个书里，抗战史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收获。刚才我讲了，我可能对世界上的大事小情都很熟悉，但是我对本乡本土的事情就不熟。我小时候，很愿意看当地的历史。记得大概是初中的时候，我老家是江西永修，我们县里给每个学校的每个学生发了一本《可爱的永

修》，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人文掌故。我们小时候看到非常高兴，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有什么样的人。后来读高中、上大学很多年没有接触本乡本土的历史。后来我不断地回去，找资料、寻访、调 查，到最后把这些历史梳理非常细：日本兵当年怎么打到我们那里去；哪一天烧了我们家的房子——这是我预估；当时蒋介石派了多少万军队死守我们家旁边那条河；18万军队打了七八个月……这些当年在我们的课本上都没有。在不断梳理的过程当中，原来的历史变成一体了。

讲抗战史我们想到的都是大的战役，包括南京大屠杀，我们想到更多的是那个。但是如果你在梳理本乡本土历史的时候，发现当时日本人在你们家旁边的庙里面屠杀了多少当地人，那你内心还是不一样，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人说话的土语是怎么样的，你觉得好象更能够穿透你一样。而且每一条道路、每一条河流 你都非常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如果能把当地的历史不断地梳理，我们回顾抗战的时候，不止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对历史的这种交代应该是更准确。 而且我在梳理的过程中也找到很多，我觉得都可以用来拍电影的故事。太多的故事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因为很长，涉及到几个人的命运。

除了那段历史，现在有一些人是50年代以后迁到我们村里的。他们的命运我也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有一个特别像是余华的小说《活着》那样的故事，我特别有感触。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县都有那么多故事。我原来写很多村子被拆的时候写过一个评论，那个评论的标题叫《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座圆 明园》，实际上也是从内心出发的。如果你在当地找，能找到非常非常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每个人的命运，都有很多的故事。

至于对我最后的结论，整体来说还不是很悲观的，因为最早我以为我们的家乡会消失，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外面打工，赚了钱，很多人还是回去建设了家乡，反正我从那种悲观的情绪里走出来了。

王晓渔：谢谢熊培云，听了这段话，我觉得很惭愧。我的家乡也是历史重 灾区，从小吃饭每天都会听到59年到62年饿死人的情况，家家户户都如此，以至于人们已经不认为讲述那段历史很重要了，实在是耳熟能详。如果有人认为那段历史很罕见，我们反而觉得很奇怪。 这恰恰就是郭老师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非常意外的，奇怪的事情，经过长期另外一种讲述的变形，反而变成不那么重要的事情。

刚才刘瑜提到的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残酷。讲到当年农村斗地主的情况，我突然想起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在一本书里面讲过二三十年代广东发动农民斗地主，结果一个农民非常犹豫，说地主对我们平常实在是太好了，不忍心斗他，无奈之下，差点上吊自杀。

我现在有很多更感兴趣的东西。刚才刘瑜提到个人记忆，一方面我们把个人记忆完全截断，完全遗忘；另外一方面，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美容”工作，重新做了修改，重新地编码。我很想了解刘瑜关于个人记忆“美容”的了解。女性比较了解怎么美容，怎么破除这种“美容”法？

刘瑜：我觉得记忆美容的问题，我先讲一个人冷月英，上了年纪的可能知道一点，她是控诉刘文彩的这么一个诉苦典型。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解放以后，她作为贫农的代表去全国巡回演讲，控诉大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后来笑蜀写了一本书《刘文彩真相》，发现当时冷月英很多控诉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比如说刘文彩的水牢，调查来调查去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刘文彩有一个水牢。冷月英80年代初还活着的时候，记者去问，这是怎么回事， 你当年说的声泪俱下的，生完孩子多少天就被抓走了，关在水牢里面等等。冷月英就说，你不要问我，你问当时的县委书记去，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她就说这个事情完全是当时的县长，县委书记让她这样说，她就这样说了，这是典型的记忆整容的例子。

回到刚才讲的，记忆自主权被剥夺的时候，记忆没有意义了，记忆成了零散的，碎片化的东西，甚至成了政治工具了。刚才你讲的整容技术，整容技术其实很多，郭老师书里面也讲到，一个是诉苦会，诉苦会不仅仅是土改的时候有，土改时候的诉苦会是很重要的动员技术。解放以后，如果你看很多人的回忆录，五六十年代，学校里不断请贫下中农跟学生们忆苦思甜，诉苦会已经制度化了，定期举行。

还有学习小组，无论你在单位，还是学校，可能公社里面少一点，但是只要在集体里面，就有定期的政治学习，有不断的对过去的诠释，还有现状的诠释。还有一方面，学习小组是自我鞭策仪式，通过这个仪式，用国家话语，国家意识形态诠释你个人生活中的细节。我昨天本来应该努力干活儿9个小时，结果我只干了8 个小时，说明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或者我昨天本来应该工作的，但是我和女朋友去逛街去了，表明我思想的落后，我对这个问题这样想的，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等等。个人历史，个人生活的细节都要被套到那个大的，政治话语的框架中去诠释，才变得有意义。你在所谓政治学习小组过程中，要不断的用一 种仪式和制度化的方式，把我们的记忆重新诠释和梳理一遍。

还有定期的写个人检查，文革的时候就登峰造极了，我看过一个人的回忆录说，因为他写了太多的检查了，写得如此之好，如此之专业化，以至于单位的人都找他来写，成了写检查专业户了。这种记忆的改造，记忆的国家化、集体化、统一化这个过程不是偶然随机发生的，是有一整套持续不断的政治仪式，政治制度来维系的。几十年的政治仪式，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当中，你对世界的看法，对国家的看法，对个人历史的看法都发生了极大的改造甚至是扭曲。

郭于华：“周扒皮半夜鸡叫”不合逻辑

郭于华：我接着刘瑜刚才的说，她刚才举的例子非常好，非常能说明问题，在座的各位我看大家都非常年轻，听到那样的一段历史的时候，今天看来真的是匪夷所思、天方夜谭、难以置信：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吗？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是确确实实发生的。文革爆发的 时候，我可能比大家年龄大不少。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不到10岁，后面的几年，文革的后几年，那时候我在上小学、在上中学，这种忆苦会不断地在学校里面举行。 包括冷月英的那个忆苦会，当时大家都叫她冷妈妈，在全国做了1000多场讲述，控诉地主阶级罪恶。

刘文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典型，今天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了。中国有四大恶霸地主典型，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和黄世仁都是文学形象，虚 构出来的，而刘文彩和周扒皮是现实当中确有其人的。刘文彩是50年代末才被建构成恶霸地主的典型形象，其实那会儿刘文彩已经死了10年了。解放之前他就死 了，把他的庄园做成阶级教育展览馆。你要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激发全国人民，因为那时候搞阶级斗争，这是一个统治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所以你要激发出大家对他们的刻骨仇恨。一系列罪行由此油然而生，其中最突出的罪行，冷月英的报告全国人民都听过，其中就有水牢这么一个场景，里面都是水，都是死人，水牢里面还有很多钩子、倒钩。冷月英生完孩子三天就投入水牢，是唯一从水牢里面出来的人。当时大家听到诉苦报告的时候，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大家觉得就是这么回 事。当时还用了很多艺术形式，拍了片子，做了大型泥塑收租院，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巡展。这个收租院今天依然在四川省刘文彩的公馆里面，依然在那儿展着，没有清楚地说明前因后果，还在那儿展着，还在那儿进行这样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以至于刘文彩的后人今天在维权，说你们不能这么诋毁我先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你们干什么？这是他在保护他历史的权利，实现他的权利。

周扒皮也是同样。周扒皮的后人、曾外孙，大家知道周扒皮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虚构的，他的真名叫周春富，是大连瓦房店区一个小的富农，谈不上是地主。但 是周扒皮之所以变成周扒

皮，是因为作家高玉宝的一本书写他的经历。作家高玉宝是从一个不识字的解放军战士被培养成为军旅作家，你就知道这一系列政治的建构，这种历史的建构，就出来了。他很小就在周扒皮家当小长工，当打工的，怎么受尽了剥削压迫。周扒皮特别坏，欺压长工，天不亮就让长工干活儿，这一切在今 天看来太不合常理了。如果周扒皮恶到那种程度，直接拿棍把大家打起来干活儿不就得了？长工到了地里，天还黑呢，看得见吗？锄错了苗怎么办？当时我们听这些的时候，周扒皮半夜鸡叫拍成了电影，进入了中小学教科书。直到今天，周扒皮的后人不干了，不光是祖上受这么多侮辱，牵扯周扒皮家族在这50年受尽了屈辱，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种种被剥夺权利，人家当然要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周扒皮的曾外孙写了一本书叫《半夜鸡不叫》，已经正式出版。

郭于华：这些例子我想跟大家交流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以往被灌输的历史，许多都是不合乎逻辑的，被建构出来的。我们经常把这种东西叫做“狼奶”。可能跟大家在座的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以往接受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真的需要重新来认识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把“狼奶”断掉，换以正常人的饮食，而不是继续迷恋“狼奶”。我们怎么辨识“狼奶”？我们都可以做到。我刚才举的例子，包括刚才刘瑜说的冷月英的故事，我们立足今天中国的现实，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我们可以有辨识能力，我们可以拒绝“狼奶”的。谢谢！

王晓渔：谢谢郭老师，我们可以拒绝“狼奶”，但是我们拒绝不了三聚氰氨。杭州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杭州的母乳里面发现大量瘦肉精，所以拒绝“狼奶”还是很困难的。

刚才提到我们怎么恢复记忆，我有很多的感想。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学者，具体研究某一个历史事件。但是有一些事件通过逻辑可以判断可信程度。刚才提 到冷月英，著名的冷妈妈，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我脑子里面就会打一个问号。在这种情况下幸存者一定是唯一的，死无对证，怎么说怎么是。包括讲到周扒皮半夜鸡叫， 如果我们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半夜鸡叫不叫，半夜干不干活儿一点也不影响收成。天天夜里面起来去锄草，说不定拔苗助长，收成更低。我想到一个细节，50年代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怎么提高的呢？为了给它增加营养，是把狗给打死，煮狗肉埋在种的稻田里面，后来把稻子烧死了，营养太多。

刘瑜：多元争鸣是个好局面

现场问答环节

提问：我来自农村，刚才提到58年我有切身的感受，历史从来没有说58年那一段。我是安徽农村的，教科书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家修了家谱，我觉得我对不起祖宗。爷爷奶奶为了我父亲生存，自己饿死了。你可以想象，我现在有孩子，我想现在的教育制度，该怎么引导？

郭于华：好像你刚才提到了你家里的情况，一个是家里的情况，还有对孩子怎么样教育的问题。其实我想无论是身为人子还是身为人父，你如果有这个能力， 而且有这种心思，有这种考虑的话，其实你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亡故的情况、历史，你可以通过对你父辈或者是其他亲属的访谈，或者了解情况，把他们记录下来。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讲给你的孩子听，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和传承者。如果从教育体制来考虑孩子教育问题，恐 怕也不是我们能够回答得了的。

王晓渔：我要插播一个网易微博网友的提问，手机尾号3824，问刘瑜老师的：集体性遗忘是一种制度性缺失，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呢？现实条件中应该怎 么建立呢？中国一直以来处于迷雾里，某一个理念的提出容易在一哄而上的理论中扭曲变形，失去原有的意味，应该怎么避免对底层问题的探讨进入这样的迷局？

刘瑜：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我觉得问题不应该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而应该是拆除什么样的制度。应该有一个言论和讨论的自由环境，允许多元记忆的出现，无论是国家的记忆还是刚才熊培云说的个人的记忆，地方的记忆。最近有一些不那么敏感的话题已经出现了多元记忆的表现，比如说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有的人 就会说，慈禧当时的立宪改革是挺有希望的，挺好的，和传统完全把慈禧说成是反动派的说法有所不同。原来的传统说法也不一定全错，比如余英时老师说了慈禧的改革就是假的。所以出现了多元争鸣的局面就是好的局面，未必反对官方言说的立场一定是对的，官方说法就一定是错的，也不一定。如果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不要有太多的洗脑和喝“狼奶”的教育方式，自然会出现比较好的局面。所谓道理越辩越明，你允许别人批驳他，允许不同的言论出来，绝大部分人有自己的判断力去决定什么样的说法更有道理，倒不用担心某一个错误的观点出现。只要你允许这种

所谓的观念市场出现，在这种观念市场当中，不同的观念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我倒觉得这个不用太担心。

提问：我想问一下，我们对当事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对农民，应不应该去告诉他真实情况？但是我们的对象又是没受过多少教育，或者说不太好用这种话语去传达，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

另外一个，刘瑜老师以前提到过，我们对政治有很多误解，有很多会把政治当成茶余饭后的说是某个派系的斗争。我二舅就这么想，但是我二舅又是一个受过 教育不是很高、都不会看书的这种人。对于这种人，我们应不应该告诉他民主是什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我想问一下刘瑜老师和熊培云老师。

王晓渔：我的方式就是给家人买《民主的细节》和《自由在高处》。

提问：但是我二舅不看书。

熊培云：我刚才听的时候就觉得你怎么告诉他，刘瑜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一个充分的意见市场，社会会趋同于某一种理性，社会理性会慢慢提高。这种意 见市场实际上暗含了一个东西：没有强制，没有说哪个是一定对的，必须得听；哪一个是错的，一定不能听。他怎么接受这个信息呢？是他自己自主消化的过程。你 给你二舅怎么说，你不强迫他，他自己慢慢接受，内化成他自己想的东西就可以了。

而我们过去，刚才说的革命者到乡下去说什么，如果伴随某种强制的话，就不一样。前一阵我看江西省原来省主席叫熊式辉。30年代，当时红军走了以后，他开始准备了很多政策，把地主的土地怎么要回来，农民占了土地怎么弄，搞了很多条条框框，为了更好的执行。后来他发现，实际上当时很多农民分给他们的土地没有去耕种；地主跑了以后，他们也跟着跑到很远的地方交租。他们不承认这些土地通过这样的分配就属于他。也是某种程度上，农民本身也是拒绝那种强制的。我想如果需要社会慢慢接受一种理性的话，更多还是开放，或者没有强制的情况下，才会更好一些。

刘瑜：不要低估普通人的理性能力

刘瑜：其实我觉得熊培云基本上替我回答了我的想法，我觉得你应该尽量的向他描述你的想法，至于他接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是我想强调补充一点，没有必要过于低估所谓的普通人——或者你二舅这种也许不读书的人——他们的理性能力。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并不需要

你是一个核物理专家或者博士毕业生才能懂。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在大多数地方是风调雨顺的，所谓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很多就是浮夸风导致的过度收粮引起的。这种基本道理并不需要特别深奥的逻辑能力，理性能力才能讲得通。你尽你所能跟他们讲一讲基本的事 实，应该不像你想的难度那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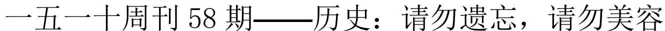
郭于华：我补充一下，刚才几位说的我都非常赞同，对农民也好、对我们自己也好，大家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谁都不傻"。尤其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作为学 者，有的时候应该非常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只有你是一个很有优势的、高高在上的，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其实普通人，农民在他们生活世界当中， 他们的生存智慧比你要高超得多。如果真把你放在那样的环境里去，相信我自叹不如，我肯定不如他们活得好。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长久以来生活在那样的苦难当中，生活在那样巨大的压力当中，怎么生活得好，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力，不仅仅是知识，需要的是巨大的生存智慧。在这方面，我们尤其要去警惕，不要有一种非常优势的心态，不要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因为我们不是救世主，也不是代言人，这些事我们做不了。有的时候你不要做可能就更好，你就让大家去讨论，去发表各 种观点，不要制约他就好，这一点跟大家说的是一致的。

王晓渔：现在有一位网易微博的网友提的问题，底层必须是一个被实践触动的社会问题，基于底层的自我表述能力丧失，从它内部成长起来的表述者还需要等待底层状况的改善，对底层的关注必须由社会的各种成员共同去进行，最后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郭于华：我想我们不能等待，为什么要等待？底层能够发出声音，其实今天他们都在发出声音，不光是要讲述历史， 其实你看他们在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是在发出声音，也是在进行自己维权的活动。包括刚才有一张图片上有一句话是当地的民歌："背靠着黄河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东山上糜子西山上的谷，咱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抓一把黄土撒上天，信天游永世也唱不完"。这也是在出发声音，我觉得可以进行多种的表述，这些都是底层的讲述，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等待，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如果作为其他的人，或者社会各个层面应该怎么去做，我想可能首先我们需要关注，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其次我们如果能够在关注之外，尽可能地提供帮 助，提供援助，当然这更是应该去做的。当然我们更需要的是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有一种制度上的进步，从制度上去保护这些底层，乃至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 包括他们讲述的权利，包括他们历史的权利。





熊培云：我接着补充一点，一方面我很赞同郭老师讲的，不要小看底层的表达能力，我在我的书里也谈到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老农在过年的时候，在一个农民家里，站在他家门前讲他的两个心愿："我身上放着两颗子弹——一颗子弹用来保卫我自己，一颗子弹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农民说的话。你从这里能看到他 的情绪，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保卫；另一方面他对社会有一些仇恨。我们不要小看底层的表达，有各种方式，有的用语言，有的用暴力，各 种方式。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实际上这种表达不是割裂的，不是这个人只表达他自己的声音，其他人的利益就没有谈到，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每个人表达的时候有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你在表达你诉求的时候，你讲我的人身安全要得到保障，你可能不是作为狭义的底层说出来的，实际上这对于所有的公民都是重要的。这方面说，不是代他来表达，但事实上已经在客观上完成了这种表达。

王晓渔：刚才听到身上两颗子弹，我想说一颗是刘瑜送的，另一颗也是刘瑜送的，因为刘瑜写过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我利用我小小的权利说两句，我们应该多听二舅怎么说，而不是教育二舅怎么说。往往二舅很有想法。包括这次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救她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她没有受到教育的毒害，保持了 基本的人性。

熊培云：不要在自己的春梦上打马赛克

提问：各位老师好，刘瑜老师刚才讲到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我是在南京上的学，每次家里有人来都带着去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历史是不能被掩盖的，只是有 一段时间不被大多数人知道。现在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是很多日本的民众还是认为死的人不是很多，或者只是小规模的行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环境是挺矛盾 的，我们小时候接受的话语体系是官方的体系，慢慢我们长大开始读刘老师和熊老师的书、郭老师的书，我们发现世界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现在的社会也是面临一种 割裂的局面。现在比以前有改善，这些书现在能出版，这些话语能提出来讲，可以进行讨论的。是否在我们能看到的将来，我们能够成为像王老师说的，能够真正实施自己公民权利的完整的社会人？

刘瑜：首先感谢你买我和熊培云的书，但是我们说的也不一定对，尤其是刘瑜老师说得不一定对。你的问题是指官方尺度的转变，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感觉中国近30年来还是处于所谓进两步退一步的阶段里面，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未来要抱着很悲观的态度。



最近提出一些概念，争取国际文化斗争的主动权，文化安全这种概念，给我一种不容乐观的想法。另一方面来说，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很不开心，对现实这个不满，那个不满，有时候只能靠看一看《新闻联播》来疗伤止痛。这种不满本身也是一种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同样一个问题，也许十年前，十五年前那个时候报纸上在讨论的还是所谓的私有企业能不能够合法化的问题，但是十五年后，大家讨论的是私有企业是不是有和国有企业一样的权利，比如说享受银行贷款，享受四万亿投资方面，在各个方面是不是有同样的权利。话语的边界其实是在慢慢移动的，如果我们用一个更长线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确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痕迹。现在人们就私营企业的问题，抱怨听起来好象是 国进民退，其实人们的权利意识在觉醒。

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权利意识在觉醒，你衡量这个国家的进步与否，你不能仅仅是看政府进步与否，还要看这个社会进步与否，这个社会的权利意识在觉醒，其实也是一个进步。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进步。以前我跟朋友也说起过，从长远来看，其实社会的进步比政府的进步更重要，因为社会的进步它是一个文化的改变，是一个地基，而政府的变化是一个制度的变化，如果你的制度变化没有这个文化的根基，实际上是非常脆弱，可能随时倒退的。

我判断中国未来，我个人始终在说，这个和郭于华老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跟其他人聊天，他们比我显得更悲观一点。悲观的原因在于，他们只是看政府是在进步还是退步，我更愿意看社会是在进步还是退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理由保持乐观的。

熊培云：我接着刘瑜的话说，实际上无话可说了。我们俩真是双子星，我想说的她刚才都说完了。的确，我的那本书也是一直谈这个。有的人很悲观，看到政 府做了一件蠢事，就说我们的国家完了。他不会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社会这么几十年来有非常大的成长。最大的成长变化就是观念的变化。包括80年代，觉得 大家在积极的做一些事情，但是80年代和今天的人相比，观念上不如我们这一代人，这些人对社会、对历史、对个人角色的认同和80年代比有非常大的提升。

对历史本身的发展，我特别愿意用一句诗："草色遥看近却无"。当你在近处看觉得没多大变化。像今天坐在这里，跟中国整体发展有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十年、二十年会发现，社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刚才刘瑜讲的，议论的边界越来越扩大，包括社会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繁荣。我还是相对来说谨慎和乐观，愿意看到好的方面。所以另外一句话，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我们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自由盘活，把自己的良心盘活。如果你做不到，那晚上你回家做梦的时候，就不要在你的春梦上打上马赛克。

郭于华：可能在悲观和乐观的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多少有一些差距。刘瑜说了，历史的进程是进两步退一步，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进一步退两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从基本上还是很赞同两位的判断。我们寄希望于哪儿？当然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寄希望于社会，寄希望于我们自身，寄希望于我们大家在公民社会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成长为公民。所以我们寄希望于这样的层面，而不是我们等着改变。唯有每一个人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前那样一个总体性社会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学习《雷锋日记》，当中有一段经典的话："我愿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 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永不生锈"。那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部件，连机器都配不上。就是一个零件，而且这个零件还自觉到，不知道叫什 么综合症，"螺丝钉综合症"？这个零件不用人家去紧你，它自己就紧。刚才刘瑜说的检讨什么的，自己脏了还把自己弄得闪闪发光，不生锈。今天已经不是这种情况 了，有在座的各位，有我们广大的年轻一代，真的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寄希望于互联网，寄希望于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和行动。

提问：四位老师好，刚才听了你们说的，我非常赞同这句话："苦难若被遗忘，对后人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首先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你们所说的底层是在金字塔的底层，是非常广泛的一个群体。如果要把底层的历史全部记录下来的话，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应该是非常浩瀚的。我想问的是， 是谁来读这些底层的历史，会有人认真地倾听底层的声音吗？

第二个问题，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如何去读底层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呢？历史就是要给后人以史为鉴的，作为我们，读了那些底层的历史，又能学到什么呢？

刘瑜：你刚才说到历史非常浩瀚，好象难以总结，我觉得是这样的，的确历史非常浩瀚，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实事求是，其实我们的目的并不是那些纯粹史料性的东西，史料性的东西对历史学家更为有用。对于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历史的那些记录当中追问是非，把那个是非的价值观一代一代往下传承，这个是重要的，虽然浩瀚，但是是可能和可以做的工作。

至于说我们要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教训，你这个问题好象我们有一个教训要得到似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首先我们要防备的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历史观。当我们去追问历史，看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肯定不是有一个教训，或者一个经验我们需要去掌握，可能更多

的是允许不同的人从历史当中吸取不同的教训。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让民众自己，让读者自己在观念的市场，在经验和教训的市场当中找到自己所需要和所能接受的东西。

郭于华：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选择。历史很丰厚，我们现在的历史也很丰厚，大家说现在中国的历史，我们读得完吗？可能读不完。但是我们可以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问题感兴趣，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但是前提是你得有的选。刚才说到历史要有不同的声音。哪怕是众声喧哗，哪怕是很噪杂的声音，有官方的、 有民间的、有非常底层的讲述，也有名人的讲述，都有。这个时候读者，或者是听众可以自己去选择他所希望了解的东西，他所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这个当中可能也 有很多人会说，我对别人的历史都不感兴趣，就对自己的家族，自己祖上的历史感兴趣，也可以；从我祖上历史得到了我想要的经验教训，也完全可以。所以我想我们对待历史的方式是应该有这个选择的可能性，给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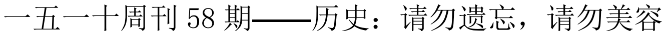
刘瑜：能激发出最多人善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提问：我先问一下刘瑜老师，你提到了历史的进步，您觉得历史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还是您自己认为的意见的市场，意见的市场中卖得最好的标准是什么，是西方的标准？

问熊培云老师的问题，印度他自己标榜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最民主的社会。我们中国从发展来讲，我们的 GDP 远远超过它的，综合实力也是超过它的。您是不是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某一个时候，整体发展或者国家的发展是可以牺牲个人，或者是部分利益，或者是思想、理念、自由、道德之类的？

问郭于华老师的问题，刚才那位女生讲的也涉及到一部分，你刚才讲底层是相对的概念，底层是相对的，历史也是相对的。因为有历史学家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个人有历史，国家也有历史的建构，是国家的历史为准，还是个人历史为准？把历史，记忆都恢复以后，目的是在哪里？是要指向过去，还是只要现在，或者是指向未来？你是要留在中国，还是移民西方？

刘瑜：我首先提一个建议，我建议拿到话筒的人尽量不要问太多的问题，给别的听众一些时间。你刚才对我提的那个问题，关于历史进步的标准，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当然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非常赞同这个标准：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怎么鉴定它，就是看它能激发出最多的人性的善还是激发出最多人性恶。当一个制度发展到能激发出最多人性善的时候，哪怕经济发展水平不是那么高，也是好的进步，我所认为的进步。



文革的时候，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相揭发，那种制度就不是好的制度，把人性的恶给激发出来了。包括像刚才说到土改中血腥的批斗，土改本身是土地的再分配，也许有它的合理性和目的，但是血雨腥风式的土改，导致两百万人被咔碴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网上微博上传一个消息，煤矿里的工人为了拿到抚恤金把自己的老乡亲友杀掉，激发出人性中非常恶的一面。包括2006年山西黑窑的事情，不仅是窑主的恶，所有普通的村民都可以路过他家，看到把奴工锁在那里的场面， 但是谁也不去揭发他，直到后来有记者发现了。一个制度能激发出最多人性的善，就是好的。

熊培云：第二个问题谈中国和印度，因为我没有去印度，我原来有这个想法，想去印度生活一段时间，去当地做一些考察，但是一直未成行。让我对比中国和印度，我不太好对比。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是可以牺牲一部分人利益？逻辑上我是不认同的，任何人都会成为这一部分的一员。这个角度来说，就意 味着这个国家发展可以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众的利益来发展，当然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的利益都要受损，这个发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必须得考虑，一些人要做牺牲。这个牺牲看你怎么来定义它，是你付出了，什么也得不到；还是我先在这个地方借贷了，最后连本带息还给你，你是不是能还给他？如果能还给他，现实中的某种利益还是可以交换的，这种交换不是强迫他去做，而要征得他的同意，这样做才是 可行的。

郭于华：刚才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发展是一个方式，一个过程，是一种手段还是根本的目标？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而不是不言而喻的。发展硬得过人民的幸福吗？硬得过人民的生存吗？硬得过作为人的尊严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加以质疑的。

至于发展总得有一部分人牺牲，我们要问，为什么发展总是这一部分人牺牲？为什么总是这么大量的、大面积的底层群体，下层群体在为发展铺路？他们成为车轮下面的铺路石。这样的发展我们当然也是要去质疑的。

你对我的问题，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和认识历史是为了什么？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穿越，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回到历史，让历史变得好一点。我们回顾历史、重新构建历史，当然还是着眼于当下，乃至着眼于未来，还是为了今天的社会能够更好，为了未来社会能够进步和发展得更好，能够真正的进步。

其实今天我想各位所谈的东西，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包括刘瑜说的人性的问题，历史在制度当中有它的作用，诉诸到价值判断，诉诸到人的理念、人对是非善恶的辨识。

当然我们说，我们不能仅仅是通过伦理道德来改善人性，制度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小悦悦事件”也好，还有现在扶老头、老太太不能扶了，一扶就出现官司了。还有去年上海出现“钓鱼执法”。惩罚善良、制裁正义，必然造成人性的堕落，造成整个社会的沦陷。所以我想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学习历史也是有这样的目的，从人性和制度的互构上考虑问题。

提问：感谢四位老师精彩的分享，我的问题：其实普通老百姓，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去表达自己，而是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幸福的生活。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之下，我们很难发现自我，如何平衡这种又要表达自己，可是我们又是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之下的矛盾？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很容易带有国家官方的意见，这个原因到底是由政治因素导致的，还是由我们文化的价值观导致的？

郭于华：这个我想是分不开的，制度和文化也有这样的相互性关系。你开始的表达比较清楚，个人的表达可能不是最主要的，而是个人追求他的幸福是更重要的，或者说更现实的。实际上这两者，如果要真正实现自己的幸福，你要看这个幸福意味着什么，如果幸福只意味着温饱，意味着物质方面的满足，我只要有一个现实的利益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基本的生存，我们每个人不仅仅需要活着，我们更需要有尊严的生活，需要表达的渠道。

（本文为 2011 网易·公民阅读“底层历史与社会记忆”读书沙龙实录，原文链接：http://book.163.com/11/1030/13/7HKA87B500923INC_all.html，有删节。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劳工研究与公民社会建设等。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代表作品：《民主的细节》、《余欢》、《送你一颗子弹》等。

熊培云，青年学者，作品：《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

王晓渔，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现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返回目录】

【行】

10-8 郭于华：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



“那些全民族经历过的艰难时世、大饥荒，甚至过去未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人的记忆和叙述中变了样，而在一些后来者的印象和想象中面目全非。巴金老先生提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即使在现实中不能成立，难道不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记忆和传承中永存吗？在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思索，是什么让我们遗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发生扭曲？对苦难和罪恶的集体记忆是保持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是收集和保存底层社会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陕北骥村是我们从事“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的调查地点之一。在历时近 7 年的工作中，当地村民感知、记忆和讲述的关于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过程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口述史”项目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每每感到对婆姨们（已婚女性）进行访谈的困难。面对我们的提问、面对我们热切的倾听和记录，她们经常的回答是“不晓得”、“忘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而我们深知在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中女性的讲述又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困境中的探索、尝试让我们缓慢但却比较深入地走进女性的生活空间与历史状态，在搜集她们能够讲述也愿意讲述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理解她们的历史和她们对历史的理解。

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这一从单干变为集体的过程对所有农户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是财产所有权的转变，也是劳动生产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给经历者留下的记忆却有着较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访谈中，婆姨们当被问及关于政治动员、土地转移和家庭财产计价等相关问题时，很难像男性村民那样给予明确的讲述。在就重大历史变迁和公共事物向这些女性亲历者发问时，我们面对的仿佛是历史迷雾后面无从明确表述的感受与记忆。在现实生活中，集体化对乡村女性而言最大的改变就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

域进入村社集体、从“转锅台”到“下地劳动”。这一活动空间的重大转变当然不可能不留下印迹，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里却是一种“无事件境”（方慧容，1997）：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无序地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时间界线和逻辑关系，也似乎看不出与重大历史过程的意义关联。然而正是在对这类日常生活细微末节的讲述中，农村女性所经历的集体化过程和属于她们的历史渐渐浮出地表。女性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经历与她们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显现出来。具体而言，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对身体病痛的记忆、对养育孩子的记忆和对食物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

农业合作化带来女性活动空间和劳动方式的巨大转变。从以户内活动为主的家庭劳动转变为户外集体劳动，对女性而言，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也是劳动量的增加。集体化以后，妇女除与男子一样必须按时出工劳动、获得工分外，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并未改变或由他人分担：做饭、洗衣、照顾孩子、缝制衣服和鞋子等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担。而在承担田间劳动的繁重程度上妇女也不亚于男子，尽管在整个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女性的工分标准始终低于男性。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变化是通过女性的身体被感知和记忆的，她们至今仍在清楚地描述自己身体的疲倦和病痛，什么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落下的，女性特有的生理状况和生育过程带来的不便和痛苦等等。另一种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关于孩子的养育：婆姨们每日下地劳动使她们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这是合作化以后女性遭遇的另一种苦难。尤其是家中若没有可以不出工的老人或是已经可以照看弟妹的孩子，母亲就只能把幼儿拴在炕上，待出工回来才能给嗷嗷待哺的孩子喂奶。而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绝不亚于身体病痛带来的痛苦，这种感受和回忆直到今天仍然让讲述者泪流满面。食物是女性讲述的又一重要内容，骥村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是饥饿与食物匮乏的记忆，当然挨饿的经历不限于女性，所有经历了食物短缺时期的村民都会清楚而生动地表述饥饿的记忆。但妇女由于其传统性别分工规定的为全家准备食物的角色，对于食物的感受更为深切。她们对饥饿的感受和对此感受的回忆并不限于自身，而关于挨饿的讲述也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女性关于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的回忆和讲述与研究者通常更为关心的“重要事件”的宏大叙事相当不同。它们并非混沌模糊，而是十分清晰、具体而鲜活，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从骥村的婆姨们关于集体化的记忆中我们多少可以体味和理解一些女性记忆的特点。研究者通常认为由于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区公共事物（包括政治领域和仪式信仰领域）以外，因而她们对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常常处于一种散漫混沌状态，没有确定的时间脉络和清晰的逻辑关



系，而且是非常个体化的和身体化的，与宏大的历史过程有着相当的距离。这种结论固然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简单了。骥村的婆姨们并非不能讲述那段亲历的历史，只是不能用通常被正式认可的话语讲述。而实际上，她们是在用身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她们决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因为毕竟那个过程造就和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因此女性琐细卑微的生活史、生命史的讲述完全可以和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建立起联系。

女性口述历史展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苦难的叙述中也不时透露出欢乐的情绪。从骥村婆姨们对合作化以后集体劳动与生活的回忆和叙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到浓重的苦涩：食物的经常性短缺，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没人照看的孩子的可怜，因事故而失去亲人的悲哀，在集体的统一管理中的不自由，等等等等。她们在讲述中常常出现的哽咽流泪也构成这种苦难表达的一部分，而整个“拉话”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对苦难的回忆引致的哭泣流泪外，也不时有同样发自内心的笑语欢声。她们对苦难的诉说和情感痛苦的表现是我们不难预料的，但讲述中不时出现的振奋和愉悦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种情绪主要出现在对集体劳动和政治活动的氛围进行回忆和讲述的时候。

从婆姨们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们在那些艰苦年代中的精神世界：与身体的疲惫、病痛相比较而存在的精神振奋和欢娱；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相对的精神生活的充实。集体劳动中热闹、“红火”的气氛和相互激励使她们多少能够“苦中做乐”，如俗话所说的“一起说了笑了，可红火了”，还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教唱歌、识字班、吃“大灶饭”和检查卫生等活动，也都是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集体化治理措施，对婆姨们来说，教和学的内容可能当时就没有掌握，或者过后也不再记得，但是这种集体活动形式本身却可以为她们带来新鲜感，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生活的全新的体验，而这种新鲜感受亦是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娱悦的来源。

亲身经历了集体化过程的婆姨们的叙述使我们不难得知，从家庭劳动者到集体劳动者，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婆姨女子们承担的劳动量更大，付出的辛苦更多，感受的苦难也更深重；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精神生活却前所未有地充实和丰富，甚至不无振奋和愉悦。对于这种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对比我们不难想到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社会性的论述：宗教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宗教和仪式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在此意义上时间和空间也都起源于社会，具有集体的性质。在宗教仪典中，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劳作虽然并不是宗教活动，但常常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运作的，与

政治仪式多相通之处，更可理解为仪式化的“运动经济”。由此我们不难解释在这种政治的、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个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的兴奋与共鸣。这种被涂尔干表述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仪式是集体认同和愉悦的来源，也是集体记忆产生、保持和不断更新的重要机制。

“集体欢腾”的概念可以对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的解释，但它毕竟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活动共性的一般概括，相对笼统和简单。在访谈中不时困扰我们的问题依然需要回答：在极为艰难的生存状态下，“红火”、“高兴”从何而来？在当前的讲述中，是时光的作用渐渐冲淡了记忆中的苦味？还是村民们对当今社会不公正的感受和今昔对比改变甚或美化了对苦难经历的记忆？亦或农民固有的安时处顺、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惯习在起作用？骥村的婆姨们在集体化的实践过程中所感受和记忆的内容应当有着更为复杂和微妙的缘由及其日常生活的逻辑，对此我们还需从她们自身的讲述中寻求答案。

婆姨们对“吃不上穿不上为甚还高兴”的回答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搭里动弹，人多，就是红火”。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合，与传统农业社会中以个体农户作为生产单位相比，这种在劳动中的集合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不同感受，对于妇女尤其如此。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氛围中走出来的女性，在每日的集体劳动和集体政治活动中会有一种欢聚的感受，同龄人之间，同性之间乃至异性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尽管是在劳动强度和身体疲劳也同时增加的前提下。集体的活动对于女性而言有如“革命的庙会”（革命的节庆），它能够带来节日的气氛和开放的感受。

“全都一样样介，普遍都生活不好嘛，穿不上都穿不上，吃不上都吃不上，孬好都平等”。从这种对“高兴由何而来”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古老的作为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农业集体化过程正是这一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统一”、“平等”也成为那一时期艰难生活中的精神支持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女性而言尤其重要。

“前人受苦，后人就享福了，这叫先苦后甜”。在骥村部分村民的讲述中，从“单干”到“集体”再到“分田单干”的过程有些出人意料地“顺理成章”，这一过程似乎不是一种改正错误的制度安排的逆向转变，而是类似前因后果关系的“先苦后甜”。一场给无数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在村民的分析与解释中具有了一种合理的逻辑，这是让人感到惊诧的。

即使在主流话语中，“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也是针对不合理、不正确的制度和政策而进行的转变，但村民却自己把原本不通的道理想通了、讲通了。“先苦后甜”成为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合理过程，它亦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力量使人们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能够讲述被后人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光。

从村民们的讲述中可以得知，对“农业社”时期艰苦生活中的“红火”、“高兴”的怀念还与对当今社会的感受、认知密切相关。当年的“大伙都一样样介”与当今社会的分化特别是分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正形成比较，从而使过去的“苦”“乐”参半中的“乐”得以凸显。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会有意无意地对“集体”和“单干”两个时代进行比较，虽然他们都能相当“客观地”评说各自的利弊，但仍不难感到当下一种普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来自于农民日渐意识到自己成为被剥夺、被欺骗、被歧视的对象。他们对于过去的怀念并非由于集体主义的优越，并非他们更喜欢大家一样贫困的生活，而是因为有现实社会中的劣势地位作为参照。物质生活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

骥村的女性生活史告诉我们，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痛苦和压抑的角色）的途径，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农业合作化中女性的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vision）。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她们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却得到“解放”的感觉，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是来自于这种幻象和感觉。婆姨们今天的回忆和叙述具体地显示着由符号暴力（symbolic power）所建立的支配治理关系——农业合作化，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完成了心灵集体化的过程，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

在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中，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又忘却了什么？底层记忆和表述与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支配和治理有着怎样的联系？是有待于认真探寻和思考的问题。

集体化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心灵的重构过程使我们不难想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大洋国”。他在著名的《1984》中描述了一个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

自由与思想成为绝迹珍品的国度。电幕、思想警察、集体活动等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使得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而其中尤其让人不寒而栗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集体活动几乎占满个人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人的生活永远处在他人的眼光之下，永远没有个人的独处，甚至性爱也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另一种权力技术就是记忆的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正如党的一句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

奥威尔所描述的是一种统治达到极致的状态，人们不难从中得知，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的，是没有未来的。我们每每感叹不该忘记的却被轻而易举地忘记，切身经历过的应该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会发生变异。那些全民族经历过的艰难时世、大饥荒，甚至过去未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人的记忆和叙述中变了样，而在一些后来者的印象和想象中面目全非。巴金老先生提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即使在现实中不能成立，难道不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记忆和传承中永存吗？在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思索，是什么让我们遗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发生扭曲？对苦难和罪恶的集体记忆是保持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是收集和保存底层社会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农民工研究等。原文刊载于《读书》2003 年第十期第 62-69 页。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5/郭于华：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

【返回目录】

10-9 孙展：历史书写：民间的努力与探索——雷颐、章立凡对谈录





“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80 年代：精英的个人反省与时代反思

雷颐：1949 年后的历史叙述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就有了一套规范要求，知识分子要按照一定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但这个不能称之为个人写史，因为它是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此外，1960 年代还有一个“写三史”运动，实际上这是跟“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的，它怎么写都有一些具体要求，当时出了一些册子，指导大家怎样写村史、怎么写社史，写这种史的时候怎么样进行加工，哪些要舍去、哪些内容不合适，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中，要把个人史编织到国家的话语建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不能称之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个人写史。

我们今天的个人写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你可能是同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你个人一种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果，不受干预不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从 1978 年之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人们根本不敢如实地谈自己经历的人与事，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所以只有经过了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之后，才有了个人写史的可能。

章立凡：以前的个人写史，多数是想自证清白，外加自我批判，再就是认罪或者辩诬。

雷颐：改革开放以后，政权对社会结构的控制方式和从前那个全能社会比还是有所不同，放松了，就给个人写史留下了空间，至于写了能不能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可以印成书，真实地记录下来。人们是从反思 “文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了反省。



章立凡：这股反省潮应该是以名人和高层的精英为主，因为话语权比小人物要大，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巴金的《随想录》对我们这种读者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

雷颐：我们读巴金的时候，很少接触到巴金那种三十年代的文风，他还有当年那种文采。（让我们）感到一种新奇吧！

章立凡：而且他是有延续性的，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变化，他从接受无政府主义开始，五十年代又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到“文革”期间又开始反思，“文革”后他写出这个作品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想过程。

雷颐：很详细地写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章立凡：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本书，就是刘晓庆的《我的路》，影响大极了。《我的路》说的是一种个人奋斗的人生观，就是她个人的经历。但是中国人觉得这与传统观念不同，写个人经历的，只能是一个英雄、模范、典型，她就写自己怎么样从一个知青慢慢成为一个名演员，里面还带有自责，所以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说她宣扬个人奋斗什么的，这本书也是个人写史的比较早的一个。

雷颐：八十年代还不能不提报告文学，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章立凡：报告文学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门类。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报告文学可以对个人史和社会史，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

雷颐：还有一种形式是口述。张辛欣和桑晔合作曾写过一本《北京人》，就是随机采访一些普通人做口述。这种形式在美国早就存在，但当时在中国还比较新颖，中国后来做口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章立凡：还有一本书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讲述小人物在“文革”时的经历，也是采取口述的形式，把大块的个人自述放在其中。

雷颐：八十年代的个人写史潮，就像后浪推前浪，可以说是互相衔接，也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

章立凡：我觉得八十年代有个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叙事。虽然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但还是尽量让作品趋同于主流，总体来讲不是对体制的反思，也不是对

时代的彻底反思。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发表条件的制约，要有发表的载体，必须要通过书或是杂志、报刊这类形式。所以须遵守一定的尺度。

雷颐：并且也跟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体制是充满信心的，觉得虽然经过“文革”，但通过这个改革，社会是往前走的。

章立凡：对，那时候是有朝野共识的。

90 年代：民间社会催生民间写史

章立凡：九十年代基本是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正式地跟主流分道扬镳了，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搞个性化写作了。当商品经济发达以后，人的谋生方式也多样化了，八十年代还是很单位化的，脱离了单位你就没饭吃了。九十年代以后，全民经商这拨改革潮，确实给了个人写史的一个经济条件。个人可以不靠国家来养活，自由度就高了。

雷颐：简单概括就是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

章立凡：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为民间写史提供了条件。

雷颐：包括发表平台。

章立凡：这里不能提到两个杂志，一个就是《百年潮》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炎黄春秋》……

雷颐：还有一个是《随笔》，好多个人写史是在《随笔》上发表。

章立凡：还有《人物》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个人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大人物。那个年代的杂志很多最后都消失了，能够延续自己的风格保存到今天，还不被读者抛弃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雷颐：那个年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是很大的平台。

章立凡：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南方周末》，只知道《羊城晚报》，就因为《羊城晚报》有个很不错的副刊

雷颐：当时影响很大的还有《文汇报》的“笔汇”。

章立凡：《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

雷颐：我记得《北京晚报》还有一个“回忆我的票证时代”栏目，有很多很不错的文章，但可惜后来停掉了。

章立凡：九十年代还曾出版过很多有冲击力的回忆录。

雷颐：实际上，这个情况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人们从谈“文革”到“反思”文革，进而到更早期的一些历史。比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都在八十年代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九十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一大批回忆录出版。

章立凡：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出版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书商，也就是民间出版人进入了市场，原来垄断的出版体制被打破，他们成了许多出版物的幕后推手。九十年代有一套《思忆文丛》，是牛汉和邓九平主编，就和民间出版人的努力分不开。

雷颐：对，但是也有很多很宝贵的特殊经历没有机会出版，这让人觉得很遗憾。像谢韬，他的经历很有趣，也很复杂。因“胡风案”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当上了马列教员，还在监狱里去给国民党战犯上课，我曾鼓励他早点写下来，但他当时忙于一场讨论，觉得日后写的时间还很多，但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写了。

章立凡：名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活动太多，有好多东西可能没来得及写出来。一方面是他时间不多，我们作为记录者自己没有抓住。还有记录条件的限制，想核对一些事情也很难。还有的是他愿意写他想说的，不愿意写他不想说的，特别是有些不便说的，因为有些跟他同时的人还在，有忌讳不愿说，有的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心里有愧不愿意写。有些事情无法与当事人对证，实际上口述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真实性的质证，质证有时需要参照一些史料和档案来核对。因为有各种条件的欠缺，在某些时候就很难进行。

雷颐：说到回忆录，一方面我鼓励大家都写，写出来才能互相印证互相校勘，才能互相补足。一定要保持一种警惕，尤其一些辩诬性书籍，很多都是在替自己辩解。但只要写出来就为另外的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或者提出不同的说法，这样就可以让以后的研究者研究。

章立凡：历史就像一张拼图，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块，历史想完全还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地还原，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拼图作业。很多人把他自己经历的某一段历史集

中地写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会越来越清晰，这个工作不是靠一两本官修正史就能概括得了的，也不是编一两本历史教科书就能概括得了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其实都有权书写，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和主流的表达的东西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它就是一个正史的参照系统。

2000 年后：互联网上的记忆库

雷颐：2000 年之后，对于个人写史，有个很重要的事物，就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

章立凡：过去所有的出版渠道都是纸媒,都是国家以书号的形式,要经过编辑加工和审读，个人想发表这些东西很困难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文字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传播了，而且这种传播的速度不亚于书籍，甚至超过书籍，它的成本比书还小，这种传播的便利就造成了第二波写史潮。虽说大家一开始还不是很重视，说我要白纸黑字，我要落在纸上。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一旦用上了互联网，就发现这个东西的力量很大。互联网为很多好的写作提供了第一道平台。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结合的平台。

雷颐：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章立凡：可以看到，近年出现的比较畅销的历史书，也不是单纯地记录或简单地演绎一下历史，作者的水平不见得比专业的差，有很多人还是很有史识的，有些人有观点，文采也还是很不错的。

雷颐：写这种回忆录未见得就是研究，比如说互不认识的人，写到同一个事情，很多细节能符合，那么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来。

章立凡：或许有的只是个人情愫，很个性化的，甚至有些私人化的，但是一旦社会注意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出来了。也有些人指责怎么可能把细节记得如此清楚。但一旦这个细节对个人有重要意义，就有可能记忆很清晰。个人记述的写法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见得要像教科书或者国史似的写法，完全可以是很多种笔法来写，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有一定之规。

雷颐：鲁迅也曾说，光有正史是不够的。

章立凡：除了文字，包括影像记述的历史也很重要。影像有时候比你写多少文字都管用，它是非常直观的，视觉一冲击，不用说什么就明白。互联网为影像历史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

雷颐：对，前不久出版了一本《红旗照相馆》，可以看做是影像记录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作者是有特殊的条件，过去能用影像记录历史，和平台、技术等一切都有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拍了照片，但未必能用影集的方式出版，因为这个成本很高。八十年代曾有一些人拍了不少老百姓生活的照片，但那时没有互联网，这些没有出来，他们个人保存了。

章立凡：你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老记者都会转成历史的书写者，因为他们亲历历史，他作为记者和过来人，本身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记忆和记录。还有他的专业是新闻，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再把写过的这些新闻重新拿来作为素材，那就变成历史了。

雷颐：我觉得这种个人历史写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人也许只是一个线索，但我觉得公民写史或者是个人写史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细节。

章立凡：对，历史的真正精彩之处就在细节之中！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出版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著作。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孙展，《看历史》副主编。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1 年 3 月刊。

原文链接：http://www.xfgjl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6500）

【返回目录】

10-10 何书彬：“饥饿计划”：让年轻人来承担历史



“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1959 年-1961 年，在那一场“三年自然灾害”中，在湖北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一个姓章的农民，却在吃了一顿饱饭后，撑死了。

2010 年的夏天，当钓鱼台村的村民们在镜头前讲述这件事时，他们的语气缓和、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不曾和自己有关的故事。而年轻姑娘章梦奇作为拍摄者，则被人们的讲述深深触动了。

章梦奇出生于 1987 年，自幼学习舞蹈，2008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身为一名学艺术的女孩，看起来发生在“大跃进”后的这段沉重历史和她有着遥远的距离，事实也确实如此。章梦奇说，以前看新闻，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但她都觉得那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拍摄完老人们讲述的饥饿经历后，章梦奇的感受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开始真正做和社会有接触的事情了”，她说。

在章梦奇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也是她的指导者吴文光希望看到的。从 2010 年 1 月起，身为中国独立纪录影像先行者之一的吴文光开始在他主持的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实施一项“饥饿计划”：他寻找自愿加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把镜头对准那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人。

和一般的“记录历史”不同，在这项拍摄计划中，吴文光更看重青年人的加入。“当下，青年与乡土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读书离开家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一个青年与乡土逐渐背离的过程。这个计划却提供了‘迎面走回’的机会，让青年了解乡土的历史，了解自己的长辈。”吴文光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年轻人来承担历史。”

返乡

20 个人加入了吴文光的拍摄计划，其中半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1985 年出生，2009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邹雪平是其中的一个，她拿起摄像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

邹家村是一个现在也只有二百多人的小村庄，老人们的回忆勾勒出那场饥饿曾在这个村子里划出的强烈印记：在那三年时间，有至少四五十人死于饥荒，在高峰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人死去。

“俺大儿子那年十一岁，饿死了，你长恩伯伯差点饿死。长恩伯伯做民工去挖沟，工地上发的是菜团子，他省下来带回家里。”

“全堂家里饿死了四口。”

“一个粮食仁儿都看不见，人们就吃地瓜蔓、棒子瓤，拉不出来，那年长痔疮的特别多”。

“榆树皮磨成面，还得想办法做成饭，家里没锅，出去也找不到柴火。”

在镜头面前，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情景都差不多的往事。其中有一件事被人们反复提起，那就是饿得全身无力的人们抬不动死去的人，只好用牛车拉到野外，草草地埋上。

刚开始拍摄时，邹雪平想不明白，为何人们说起死亡如此平静，甚至在说到自己的孩子饿死时也没多少表情，后来她就想：“可能这种事情他们在当时见得太多了，已经见怪不怪了。”

邹雪平问起饥饿的原因，人们的回答众口一词：“要还苏联的债，粮食都拉走了。”

在章梦奇的拍摄中，人们对饥荒的原因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粮食不但有，而且产量还“过度”了，生产队的队长们谎报产量，超量征收，在上交完国家后，把剩下的粮食都私存了，其他人则没东西吃。

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的余仙堂是受访者中让章梦奇印象深刻的一个，他给章梦奇讲了亲身经历的很多细节。饥饿蔓延时，余仙堂是一名医生，他治疗浮肿的人，“看人躺在那儿，要打葡萄糖，结果葡萄糖的盖子刚打开，那人就死掉了。”

关于那个“撑死”的村民，人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上面来了一个书记，在小队长家吃晚饭，让他去做饭，结果剩下的吃不完，又不能倒掉，怕人看见啊，就让他全吃掉，把他撑死了。”

钓鱼台村是章梦奇的父亲出生的村庄，自幼随母亲在海南长大的她并没有多少在钓鱼台村生活的经历，当她拍摄时，她让在村里的大伯带着她，以建立她和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刚开始，村民对她的拍摄计划稍有怀疑：“你拍摄这些干什么啊？”大伯也开玩笑说：“她是记者。”在章梦奇耐心地做了解释后，大多数人的顾忌才消除了。

邹雪平从小在邹家村长大，和村民向来都很熟悉的她拍摄起来就非常顺利。村民看到摄像机都很兴奋，一些年轻人还围着邹雪平喊：“拍我啊，拍我啊。”邹雪平告诉大家，历史书上对“三年自然灾害”说得不多，想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过来的，人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都是本村人，都很想说。有些人像诉苦一样，说出来好受一些，不仅仅说怎么经历饥饿，也说之后怎么建立家庭。”邹雪平说，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尽量避免让大家有“正式受访”的感觉，先聊天，明天或后天去再采访，慢慢地进入他们的生活。”

拍摄完成后，邹雪平剪辑出一部名为《饥饿的村子》的纪录片，学艺术的她，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用纪实的素材，营造出一个“虚构的村庄”：村子里面没有年轻人，也没有小孩子，只有说话和行动都很迟缓的老人，以及空旷的村庄和原野。邹雪平说，她这样做，是想表达一种“消失”的意味。

吴文光和他的朋友评价邹雪平的片子：“牛逼闪闪、内敛、沉着”，有“中国的《百年孤独》”的调子。在《饥饿的村子》里，一张又一张老人的面孔出现，讲述，又消失掉；最后，15 个老人的面孔又依次出现，但是都只有活动的嘴形而不再有任何声音，历史在沉默中退场了。

参与“饥饿计划”的人里，一共有 17 人剪辑出了影像素材，吴文光把它们集合起来，做了一份 8 小时长的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又以此为基础，排练出一场以饥饿为主题的剧场演出，演出者都是拍摄“饥饿计划”的年轻人。2010 年 10 月，演出与《公共影像档案》的放映在草场地工作站同时进行，演出是 8 个小时，《公共影像档案》则在几天里从中午

到晚上，10 分钟一次，反复放映；同时，他们还制作了由被拍摄者的面孔组合而成的“饥饿者肖像”，挂在演出场地的墙上。

同样是在 2010 年 10 月份，吴文光还带着邹雪平和章梦奇的片子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纪录片双年展并放映；2010 年 12 月，吴文光和参与“饥饿计划”的年轻人又带着他们的影像和演出去了深圳。

遭遇

邹雪平的片子拍出来后，她父亲开始惴惴不安，他问女儿：“为什么要把毛主席领导时不好的事情拿出来呢？你这样做，会不会‘犯错误’啊？”

邹雪平就解释：“没有问题的，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但是这几句解释很难打消邹父心中的疑虑，他 1953 年出生，中专毕业后在一个棉花厂做会计，入了党，后来自己开加油站。

听说女儿的片子还要在台湾放映后，邹父更不安了。父女二人在电话里不断地争执，邹雪平感觉到：“我给他解释也没有用，重要的是让事实说话。”

在台湾放映的效果很好，很多人看后都觉得很棒，邹父听了也松了一口气，给女儿说：“没事就行。”

但是邹雪平觉得，春节回家，她少不了还要“挨批”，因为两代人的思维有着太大的不同：“我自己没想那么复杂，不像他们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想到批斗。你给他说再多，他也不听你的，他觉得你是小孩子，你不懂，你没经历过以前。”

章梦奇等人则是在拍摄中就遇到了类似情况。“大都愿意说，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些事情（饥饿）不太能说”。来自湖南的年轻人罗兵在拍摄前，想了拍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但就是没有想到“还有不敢说这种情况。”

有个老人正对着罗兵的镜头正讲着饥饿，这时老人的女儿回来了，立刻打断了她老爸的话，让他不要乱讲。还有的是本人就不敢说。这让罗兵感觉到，那种还没被批斗就被吓得自己了断的历史并不只停留在过去，而是一直都在。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唐志在拍摄中，也像邹雪平一样遇到了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在家里，她和爸妈无意间聊到雷锋，唐志说有人认为那个“雷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她爸爸一听就火了：“毛主席都说了全国人民要向雷锋学习，那么多书啊，照片啊，那么多故事啊，怎么都可能是假的？”

在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放映后，吴文光和这些年轻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有观众问：“他们都饿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抗议呢？”对此，吴文光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对他们（那些老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收获

年轻人们带着拍摄的素材归来，吴文光的第一印象是：“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都更有光彩了。”

吴文光看到，这些年轻人从里到外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不看作品，就看他们的操行、态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都很大”，吴文光说，如果说在拍摄计划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对这段历史还仅仅是很多感慨和冲动的话（拍摄前几乎每个人都看了《定西孤儿院纪事》），那么在拍摄后，大家又经过持续不断的讨论、交流，每个人就有了更多的思考，并且思考的深度在增加。

邹雪平在拍完片子后的直接感受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身份”了，以前她不好意思对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农村人”，“做完这个作品后，感觉轻松很多”，她说。

另外，和章梦奇一样，邹雪平不再觉得历史和自己“没关系”了。“拍摄饥饿的过程中，我慢慢不再冷漠地对待以前发生过的历史。对自己的认识，包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认识到的。”

唐志的收获尤其让吴文光感到高兴。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吴文光觉得：“这样她在一个层次上纵深下去，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我想这样她得出的作品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分量。”

吴文光自己也参与了拍摄。“我也应该有自己的村子”，他说，1956 年出生于昆明的他，曾在云南富平县做知青，他就回了那个他插队的村子去拍摄，但是拍完后他觉得，他的收获还是没有年轻人那么多。

“他们去的都是自己老家的村庄，不是去河北啊什么地方随便踩点一个村子，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采访、拍摄一些影像回来，而是要发现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生活，发现村子的从前，听老人没有讲过的话，这样他不仅仅可以拍到重要的资料，同时自己在返回的过程中可以自我发现，在对往事的寻找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以前和未来，在历史的大话题下定位自己。”吴文光说，“毕竟他们是第一次返回，扑面而来的东西他们能完全接受，如果让 30 多岁和 40 多岁的人来做这些，就会有选择地接受。”

目前，“饥饿计划”还在进行中。邹雪平说，今年春节回家后，她还要接着“拍摄饥饿”，让人们讲述更多当年的细节。

吴文光则鼓励这些年轻人“一直走下去”，他说，“饥饿计划”没有“截止日”。

（何书彬，《看历史》记者。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1 年 2 月刊。原文链接：http://nh-gjls.i.sohu.com/blog/view/167873561.htm）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陈仲伟：数据证实—中央候补委员在大跃进中更为激进

在比较中国和民主制的印度时，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高效率赞叹有加。那么这种高效率来自哪里？如何评价？以该问题作为切入点，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James Kung 教授和 Shuo Chen 博士进行了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1 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

作者利用 1959-61 年的大跃进饥荒为例，探索这种激进（高效）行为的制度成因。大跃进运动为该问题提供了难得机会，因为期间的大炼钢铁、农业卫星、“敞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以及 1958 年冬季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其激进闻名于世。

传统观点一般将这种激进行为归咎于领导人性格因素。在本文中，作者并没有否定这种观点。然而这种观点只能就事论事，却无法揭示出背后的系统性成因。

本研究发现：激进行为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在权力自上而下的国家中，为了谋求晋升，官员必然实行上级偏爱的政策而忽略民众需求。具体到大跃进运动，上层的偏好就是粮食征收，以完成国家工业化目标。

在证明上述观点的过程中，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测量不同领导人面临的不同晋升激励？作者发现，不同省级领导人在党内级别是不同的：有些省份的领导人是中央委员，有些是候补委员，有些甚至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不同的级别蕴含着不同的激励程度，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级别可以用来测量激进行为，而在所有级别中，作者认为那些是候补委员的省级领导人最为激进。

候补委员在粮食征收上明显激进

晋升的激励来自于权力的差别：就中共八大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而言，全国党政军最重要的 513 个职位中，每位正式委员平均兼任 4.3 个职位，但候补委员仅兼任 2.97 个职位。正式委员兼任的职位不光重要，而且多数为党政军中央的关键部门，而候补委员多任职于地方政府和群众组织。此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候补委员只有发言权而无关键的表决权。

这些权力的差距使得候补委员有明显的激励通过发挥激进行为去谋求晋升，而大跃进运动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通过对比运动期间不同政策的实施情况，作者发现那些由候补委员主政的省份在粮食超额征收率、放农业卫星数量、公社大食堂的普及度、集体化进度四个指标中均超过其他由正式委员和非委员主政的省份。

用更加严谨的多元计量回归分析，作者进一步证实了先前的假设——那些由候补委员担任第一书记的省，比其他级别委员主政的省平均每人多征收 17.62 公斤的粮食。换句话说，官员为了谋求晋升而推进激进行为可解释大饥荒期间 16.83%的非正常死亡。

为什么是候补委员？

虽然已经回答了本文开始提出的研究问题，但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作者依然需要排除所有可能威胁他们结论的其他可能性。最明显的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正式委员为了进入政治局不是一样需要表现激进吗？非委员不也需要谋求进入中央委员会吗？为什么他们的表现没有和候补委员一样激进？

作者通过研究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所有 300 多名成员的简历发现，这些成员的资质深浅和他们的级别是成正比的。这些资历包括：是否经历长征、解放战争期间是否有军事服役经历、建国时的党龄以及前七次党代会上入选中央委员会的次数。具体说，级别越高需要的资质越深。

基于此假设进行的计量分析发现，有两个经历对于两个阶层的晋升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于正式成员，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均需要拥有长征经历；而相对那些非委员，绝大多数正式委员均拥有解放战争期间的军事服役经历。因此，对于那些没有长征过的正式委员和没有军事服役经验的非委员，他们现在级别已经事实上成为其职业的最高点，获得进一步晋升的概率很小。而统计证据却发现这两个重要的指标却无法区别出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因为，候补委员谋求成为正式委员并不存在这些既定的障碍。对于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征收粮食！

作者认为，该文虽是历史研究，但其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证据可以解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官员行为。在作者看来，当下官员推动 GDP 的积极性和大跃进期间为了工业化征收粮食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及制度设计缺乏纠错机制，官员为了谋求晋升所推进 GDP 的行为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环境污染、不平等加剧、征地导致的社会矛盾突出等等。由于 GDP 依然在晋升考察中占据第一重要的权重，地方官员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激励。因此，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制度再设计并合理引进官员问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James Kai-sing KUNG and Shuo Chen."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 (1): 27-45.

（本专栏由政见 http://cnpolitics.org/供稿。）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本周陈光诚相关新闻

5 月 3 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与陈光诚接触的经过，包括他进入使馆后如何同他交谈以了解他真实的想法，陈光诚的诉求，为何离开使馆等等。尤其是陈光诚因获知家人被山东方面威胁而感到不安，骆家辉则表示他离开使馆未受到压力。

新闻：http://fmn.cc/Knwqg2

由于陈光诚被困于北京朝阳医院无法外出，同外界的接触也被限制，外界只知他家人所面临的威胁却不能获知他的具体想法。因此他委托好友帮助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明确了他和家人想去美国读书，并对美国使馆提供的帮助表示感激等等。

新闻：http://fmn.cc/IIMryp

自从 5 月 2 日陈光诚一家进入朝阳医院治疗，有不少关心他的朋友想去探望，但是医院外大量警力却对人们进行了阻挠，刘艳萍想在生日那天送蛋糕给陈光诚的儿子，却被多人抬走拘禁了 9 小时。江天勇律师更是被警察带走，并遭遇暴力，耳膜疑似被打穿孔，警方还拒绝他去医院治疗的请求。

新闻：http://cn.fmnnow.com/?p=5271

5 月 4 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陈光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如果想出国留学，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像其他中国公民一样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新闻：http://fmn.cc/JZKFJH

5 月 4 日到访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召开新闻会，她对中方表态感到鼓舞。美国务院表示，一所美国大学授予了陈光诚奖学金，中国表示将接受陈光诚一家的出国申请，美国也将尽快批准他的签证。

新闻：http://fmn.cc/KnxNeL



5 月 5 日，济宁律师网上一则山东律师协会关于陈光诚并非执业律师的声明引发了关注，该网站在这则声明下还放上了陈光诚一家的照片和全部详细资料，内容有陈光诚多年维权的事迹，没有违反法律却被官方软禁的经历，当然还包括各界人士为陈光诚声援的情况。

新闻：http://fmn.cc/JalG55

陈光诚 8 日晚间接受公视《有话好说》节目的访问时表示，目前尚未拿到护照，因此本周赴美的消息也不知从何而来。不过，他也证实，官员已告知他中共当局愿意发出护照，让他前往美国留学。

新闻：http://fmn.cc/KNR71o

有份参与救援陈光诚却失踪多日的何培蓉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她说陈光诚其实是 19 日晚上 9 点左右出逃的，直至何培蓉 23 日去接他，他至少在山东省境内隐匿了三天。虽然当地人不敢藏匿陈光诚，但似乎也没有人报警，陈光诚则一个人连续 17 小时不吃不喝，持续的逃亡。最终陈光诚在 23 日由何培蓉接到北京交给另外参与行动的网友。

新闻：http://fmn.cc/JfeyRP

陈光诚事件在民间引发高度关注，官方媒体《北京日报》5 月 4 日发文"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文中用文革式的语言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指陈光诚是美国抹黑中国的工具。同日，《环球时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亦齐发社论，批判美国。

新闻：http://fmn.cc/IIRLC2

中菲黄岩岛纠纷

中菲双方关于南海黄岩岛海域的纠纷发生已近一个月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中国民众对于南海局势的发展也投以了很高的关注，而央视 5 月 7 日的节目中女主播还发生了口误事件，虽然事后道歉，但已造成了一定影响。

新闻：http://cn.fmnnow.com/?p=5386

中国驻菲使馆 5 月 7 日发出紧急通知，据悉菲律宾一个侨民组织号召本月 11 日中午全球菲律宾侨民加入反华游行，将在各地中国驻当地使馆或领馆前抗议。使馆要求各驻菲中资机构注意人身安全，避免发生争执。

新闻：http://fmn.cc/JWgf5f

5 月 9 日，国家质检总局发通知称，因多次从菲律宾进口水果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将加强对进口菲律宾水果的开箱和抽查比例，并要求各局对辖区进口菲律宾水果检验检疫风险进行评估。质检总局称已多次向菲方通报，要求其调查水果存在“害虫”的原因，并采取改进措施。

新闻：http://fmn.cc/JWfZn4

由于局势变得紧张，中国媒体报道称鉴于菲律宾旅游的安全风险,为确保中国公民安全,目前国内多数旅行社已暂停赴菲律宾旅游的发团和报名,并开始实施劝退、全额退款等措施。

新闻：http://fmn.cc/JWgc9R

菲律宾媒体则报道指，据菲军方报告称，在黄岩岛海域的中方船只数目已经从上周的 14 艘增加到了目前的 33 艘，其中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执法船 310 号、中国海监船 75 号和 81 号、7 艘渔船、23 艘快艇。而菲律宾的船只只剩下两艘。

新闻：http://fmn.cc/IXoJQo

解放军报 5 月 10 日发评论称，“任何事情都有个度。中国在黄岩岛问题上隐忍不发，不是软弱，而是克制。若有人真把中国当“纸龙”，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人妄图抢夺黄岩岛主权，不仅中国政府不答应，中国人民不答应，中国军队更不会答应。”

新闻：http://fmn.cc/JWgXj0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通化金马 5 月 7 日晚间再次发布公告，又有两批次的胶囊产品被检验出铬超标，而且总共两万盒左右的胶囊全部在 2011 年被销售，以上两批次胶囊来源是被央视曝光的浙江新昌县的华星胶丸厂。此前通化金马称只“临时”购进过 100 万粒胶囊。

新闻：http://cn.fmnnow.com/?p=5351

继内地爆发“毒胶囊”事件之后，近日香港又查出药用胶囊铬超标。香港制药厂制造的一款名为“《德国永达商标》特效强力消炎丸”的中成药胶囊样本，被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验出致癌物质铬含量超标 41 倍。此前，澳门也查出并回收一批铬含量超标中成药，并呼吁市民停止使用。

新闻：http://fmn.cc/JWiKol

http://fmn.cc/JSTel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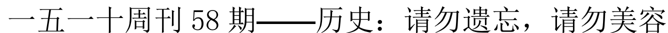
《新世纪周刊》近日报道称，2009 年下半年，住建部水质中心做了一次覆盖全国 4000 多家县级以上城市自来水厂的调查，但结果至今未公布，多位接近权威部门的业内人士说实际合格率也就是 50%左右。报道还指中国没有城市实现直饮水，由于管网问题水源会遭到二次污染，而渗入其中的重金属无法通过普通手段去除。

新闻：http://fmn.cc/IQJahV

中国媒体近日曝光山东青州一些蔬菜商贩使用甲醛溶液喷洒白菜进行保鲜的现象，新华社报道称，一些菜商反映，喷甲醛给大白菜保鲜的方法已沿用三四年。但是甲醛对人体的危害很大，长期吸入的话，严重可导致白血病。

新闻：http://fmn.cc/IADLp8

据韩联社报道，自从去年 8 月发现首例案件以来，非法出口到韩国的“人肉胶囊”日益增多，这种胶囊由由死胎或死亡的婴儿制成的。到目前为止，韩国海关已破获 35 起未遂走私案，走私者试图通过旅客的行李箱或邮寄方式将总计 17451 颗胶囊走私进入韩国。



新闻：http://fmn.cc/JJRJUR

半岛英语台驻华记者被驱逐

5 月 8 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刊文称半岛英语台记者 Melissa Chan（陈嘉韵）被中国当局驱逐，由于一些敏感报道，她的签证被中国拒绝续期，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深感震惊，认为是中方在用签证恐吓记者。而半岛英语台也于 8 日宣布将关闭其中国分社。

新闻：http://cn.fmnnow.com/?p=5357

5 月 8 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称是依法依规，亦按照有关媒体及记者的表现处理。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是自由的，但强调他们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传媒职业操守。被问到事件涉及什么违规行为，洪磊说该名记者应该“心里清楚”。

新闻：http://fmn.cc/ISSUqw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对中国驱逐外国记者感到失望，会向北京当局表达关注。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真正触怒中国的是一段去年 11 月播放的关于中国劳改营的纪录片，但陈嘉韵并无参与制作。

新闻：http://fmn.cc/K3KlG3

中国官方高层新闻

路透社 5 月 9 日报道，有三名消息人士称，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正考虑一项建议，将十八大举办日期从原定的今年 9 月或 10 月，推迟至今年 11 月至明年 1 月之间。消息人士称，这一情况在过去五次党代会中曾两度发生。

新闻：http://fmn.cc/KNWWMg



5 月 8 日，扬州泰州机场揭牌暨首航仪式隆重举行。今年 3 月 2 日江泽民为该机场题名。近期彭博社的记者还在上放出了一张他 4 月的照片，是江泽民上个月回到北京，并和星巴克 CEO Howard Schultz 会面的场景，引发了关注。

新闻：http://cn.fmnnow.com/?p=5409

5 月 9 日，中国政法大学的新闻网站，发出一条快讯，称该校 60 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今天上午来到昌平校区视察。

新闻：http://cn.fmnnow.com/?p=5416

将于 5 月 14 日出版的新一期《时代》封面，再次选择了薄熙来作为封面人物，而且标题更加犀利，直指中国为"丑闻共和国"。杂志关注了中国高层的动态，以及关于薄熙来的一些传言和相关事件的处理结果。

新闻：http://fmn.cc/KNRBog

其他重点新闻

今年国内油价首次下调，发改委决定从 5 月 10 日零时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330 元和 310 元。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内汽、柴油价格与国际市场趋势总体上一致。该负责人同时称根据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油价"涨多跌少"是必然的。

新闻：http://fmn.cc/KnAmxj

卫生部日前发布紧急通知，对医院重点科室部位实行 24 小时安全监控，要求加大安保投入，配备必要的装备，各级主管部门还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涉医违法犯罪行为。

新闻：http://fmn.cc/JvgAjY

5 月 5 日一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发布者称照片是湖北孝感一中高三学生边打吊瓶边学习的场景，整个教室挂满了吊瓶，而教师就在这样的场景下授课。网友惊呼现在高考竞争已到如此激烈的地步，据悉吊瓶内是氨基酸，教师称是国家补贴学生打氨基酸。

新闻：http://fmn.cc/JnWEwJ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称，每年“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敏感节日，一些退役上访军人会被地方政府作为维稳对象，派人加以重点看护，这在一些地方已是常态。当前，退役军人群体上访已成为影响地方稳定的第二大因素。

新闻：http://cn.fmnnow.com/?p=5298

5 月 7 日凌晨，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播出了一段 41 分钟专题片《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片中曝光了多段今年四川等地藏人自焚的视频画面，还播放了达赖喇嘛的讲话片段。据悉该专题片还将安排在央视外语频道，播出西、法、阿、俄版，并在国际频道欧洲版和美洲版播出中文版等。

新闻：http://fmn.cc/IANrQr

据香港政府最新消息，今年 9 月国民教育将率先在小学试行，由于民间反对之声不断，5 月 7 日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称，国民教育是国际惯例，并非中国独有，也非“政治洗脑”。

新闻：http://fmn.cc/IAFDOB

中国电影人应亮拍摄了一部以杨佳案为背景创作的独立电影，并于今年四月底在韩国光州举办的电影节上放映，同时应亮的家人也遭到了官方的骚扰，据影视圈的人士讲，他本人也被困于香港无法回家。应亮则在 Facebook 上撰文希望父母不要屈服于压力，不要纵容权力。

新闻：http://cn.fmnnow.com/?p=5315

4 月 28 日开始，黑龙江哈尔滨的退休职工变连续多日到省政府前抗议退休金过低，据网友在微博上表示，今年中国普遍调高退休人员工资，但黑龙江省的加幅落后于其他省份，退休金难抵物价飞涨。4 月 28 日起，每天都有数千名退休职工到省政府上访，要求增加退休金。

新闻：http://cn.fmnnow.com/?p=5336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4 月 25 日，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公司和国家电网陕西省分公司之间因利益冲突爆发武斗事件，这已是 4 年来双方发生的第二次激烈冲突。最后不得不由省府高层出面调停。

新闻：http://fmn.cc/IOT9mD

5 月 8 日，网友发现王小山、诗人俞心樵等人的新浪微博帐号被删除，而这两位并未讨论敏感话题，加上此前一批人士被删除帐号陷入不断“转世”的境地，运营商的举动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和追问。

新闻：http://cn.fmnnow.com/?p=5382

4 月 27 日曾在江西师大散发传单的、热心公益的人士——游明磊，据悉已经被正式批捕，且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热心帮助他的网友指他现在被关押于南昌市第二看守所。

新闻：http://cn.fmnnow.com/?p=5390

5 月 9 日上午，广州杨箕村拆迁空地内一栋 5 层待拆居民楼上，40 岁的杨箕村民李洁娥纵身跳下当场身亡。据目击者称，跳楼前李洁娥曾散发遗书，称此举与其房屋被拆迁有关。当天，汪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表示，“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新闻：http://fmn.cc/JeTXx0

http://fmn.cc/KkvkBI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秦晖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Online（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cochina）

本期编辑：黄雯怡 黄海

校订：陈楚君

主编：方可成　丁昕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周梦蕾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